

年

卷

期

2

8

第

第

29 JUN 1934

再生

第八期

第二卷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

現銀外溢果由於銀價回高乎？

經濟生活在此人類歷史中的地位

中學生智識之基本

選舉與代表制度

經濟史觀



記者

張君勱

諸青來

吳惟平

張君勱

鄒文海

錦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NATIONAL RENAISSANCE

VOL. II NO. 8 MAY 1. 1934

菲希
德

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摘要

倭伊鏗節本 張君勳譯

菲希德氏之「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成於一八零七年軍侵入德國之際。其目的在提高德國民族之自信心，臚舉國民之受病處，而告以今後自救之法，刊行以後，爲世界各國所傳誦。惟原文過長，經德國哲學家倭伊鏗氏摘要，雖刪去繁重，然絕不影響原講之真面目。此書經張君勳先生譯成後。分登「再生」，深爲讀者所歡迎。現四版已出，每冊祇售大洋五角。今我國外患憑陵，敵兵壓境，凡我國民，應速謀自救之道，菲氏之言，旣已藥國亡家破之德意志，吾國人誠有意於求自救之策，實應人手一篇。

再生雜誌社發行

再生雜誌 第二卷第八期

目錄

-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記者
-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張君勳
- 現銀外溢果由於銀價回高乎？……………諸青來
- 經濟生活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吳惟平
- 中學生智識之基本……………張君勳
- 選舉與代表制度……………鄒文海
- 經濟史觀（法國賽亨利原著）……………錦柏重譯

徵求推銷代售啓事

啟者，本雜誌材料豐富，爲國內有數之刊物，出版以來，頗受讀者歡迎。茲爲促進文化起見，擬增加各地推銷處寄售處，折扣從優。本社除現有代理者外，凡各省市區各商埠各學校，有願爲本雜誌推銷者，均請開具詳細店號地址，來函接洽爲禱。

本雜誌以後每逢一日發行。定閱全年國幣二圓，半年，國幣一圓一角，郵費在內。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謹啟

北平西城石板房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記者

中國到了今天的樣子，究竟病根在那里呢？有人說是人民程度不够；有人說是軍閥鬧的厲害；有人說是受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而我們看來，這些話亦可以說是都對。不過這些都只是症候而不是病，譬如肺癆症，其症候是咳嗽與發熱等。但却不可把咳嗽與發熱就認為病即在此。所以專醫咳嗽，僅治發熱是醫不好肺病的。換言之，即這樣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必是由於未曾認清病根。對於中國的情形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們不妨暫且迴溯十年以前的情形，拿來對照一下。試問當時軍閥鬧得有今天這樣厲害麼？沒有。試問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有今天這樣厲害麼？沒有。人民程度比今天好麼？未見得。然而何以人民程度稍進，乃反而軍閥更猖獗得厲害，外國經濟勢力更壓迫得厲害呢？換言之，即何以愈是有些人們明白軍閥的爲惡，而反愈見軍閥猖獗呢？何以愈是有些人們知道外國經濟勢力的可怕而反愈見外國經濟勢力更侵入一層呢？可見這些都是症候而不是病根。要明白這個道理，我們須得換一個方面來說。即試問中國所最急需的是甚麼？往往病之所在，就是缺憾之所在。缺憾之所在，就是需要之所在。問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甚麼即不問中國今天的病在那里。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明瞭的回答，就是說：中國所最需要的就是在於造成一個具有近代式政府機能的民族國家。我知道有人一聽這句話必定反駁道：你們所主張的乃是倒果爲因。因爲近世國家的成立必在剷除了軍閥以後；必在推倒了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以後。現在就講近代式國家的造成，豈不是倒果爲因麼？我們敢說我們的主張決不是倒果爲因，而論者這樣的論調却正是倒因爲果。何以言之？仍拿肺病來作比喻。試問醫肺病是否必須把細菌先殺乾淨麼？可見醫病與醫國原無二致。決不是單純專從排除障害一方面着手。現在的人們不明此理，一味高呼「除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實在是把事情看得太有段落了。老實說，肺病的治愈就在於患者的抵抗力。抵抗力增加一分則病便減退一分。本來沒有分明的段落。抵抗力是漸漸增長，而病亦是漸漸減去，所以革命不是救國，而只是救國的開始。無論那一個國家從沒有革命立刻即如由地獄而昇至天堂的；惟有看以後的施設如何。所以我們以爲這個救國的序幕是否仍不能不爲一種革命，現在暫且不談。因爲革命的需要與否完全看環境而定。環境必須要革命，自然是不能避免，亦不必避免。環境不需要革命，又何必硬要如此呢？因此現在不談這一層，而直接來說一說近世式國家的形成。

倘使有人問我：中國甚麼東西最壞？大家都知中國比不上外國的地方太多了。武器不如人：人家有大砲飛機；我們只有步槍與大刀。但在我們看來，步槍與砲究竟還是五十步之

與百步。所以中國雖事事不如人，而就中最不如人的却可以說是政府。因此我敢回答這個問題道：中國最壞的東西就是政府。於此所謂壞不是有甚麼道德上的意義，乃只是指其失却職能而言。

譬如一個人的身體，目司視，耳司聽，腦司思，腿司走。倘若目猶能視，耳猶能聽，腿猶能走，而可惜獨有腦不能運用，這便是腦中樞失了其職司。可以說腦壞了。中國的東西固然條件不及外國，然而尤其和外國不能比較的是所謂司中樞命令的政府。中國的政府最壞不自今日始。現在的政府固然是最壞的，然而以前些政府亦同是壞的東西。國迄今未曾產生良好的政府就是中國所以直到現在不能立於世界各強國之林的唯一原因。

中國從來沒有好政府，這個事實不但為中國人所公認，並且亦是外國人對於中國所下的公評。須知一個國家假使其政府不行，則等於一個人其腦中樞不行一樣。腦中樞不行的人雖有健全的四肢亦沒有用處。這一次的對日作戰更證明了這個道理。兵士以大刀來肉搏，這種不怕死的精神真可佩服。小販走卒婢女車夫都肯把他們血換來的錢捐了出來，情願自己受饑，這種愛國精神求之歐人亦不多見。然而最後的結果却與事實絲毫無補，依然是一場空。可見人民好是等于健全的手足；倘使沒有好政府便等於腦中樞壞了。

其實這個非改組政府不可的理由在清末早為人們所見到了。於是有立憲運動，有革命運

動。無論立憲與革命，其目的是一樣的。都是想把古代式國家變為一個近世式政治的國家。換言之，即想把未形成國家的變為具有近世組織的國家。但不幸得很，他們都失敗了。他們失敗的原因在那兒呢？當然各有各的原故，並且原因複雜。不過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他們把政治的改革看得太容易了。

因此乃有一種反動：就是有人以為從政治下手來救國是勞而少功的；不如從別的方面下手。於是有文化運動，有社會運動。有人專事於教育，以為教育辦好了，政治就會有辦法。有人致力於思想，以為非變化中國人的人生觀不能有救藥。其實事實是很顯明的。苟其政治辦不好，其他一切社會事業亦必沒有一件能順利進行。所以避去政治而不譚乃是一種國民的病態。我們決不能因為累次的政治改革都失敗而遂謂此路不通。不談政治的人們儘管自己不去干與政治，而實際上政治的影響却天天來強加在身上，致不能不感苦痛。這可說是：你要避他；他偏來惹你。我想這幾年來，無論在商界，在教育界，在農，在工，所有人們必都是感有這樣的切身苦痛罷！可見無論幹任何社會的改造運動，而政治的改革必是不可缺的。多少年來的苦痛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使我們知道人在社會生活是一天不能離開政治。與其避開却不如大家硬起頭皮來，去闖過這個難關。老實說，政治一關倘使過不去，一切社會事業亦就休想有辦法。

菲希德

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摘要

倭伊鏗節本 張君勳譯

菲希德氏之「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成於一八零七年軍侵入德國之際。其目的在提高德國民族之自信心，臚舉國民之受病處，而告以今後自救之法，刊行以後，為世界各國所傳誦。惟原文過長，經德國哲學家倭伊鏗氏摘要，雖刪去繁重，然絕不影響原講之真面目。此書經張君勳先生譯成後。分登「再生」，深為讀者所歡迎。現四版已出，每冊祇售大洋五角。今我國外患憑陵，敵兵壓境，凡我國民，應速謀自救之道，菲氏之言，既已藥國亡家破之德意志，吾國人誠有意於求自救之策，實應人手一篇。

再生雜誌社發行

再生雜誌 第二卷第八期

目錄

-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記者
-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張君勳
- 現銀外溢果由於銀價回高乎？.....諸青來
- 經濟生活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吳惟平
- 中學生智識之基本.....張君勳
- 選舉與代表制度.....鄭文海
- 經濟史觀（法國賽亨利原著）.....鮑柏重譯

徵求推銷代售啓事

啟者，本雜誌材料豐富，爲國內有數之刊物，出版以來，頗受讀者歡迎。茲爲促進文化起見，擬增加各地推銷處寄售處，折扣從優。本社除現有代理者外，凡各省市區各商埠各學校，有願爲本雜誌推銷者，均請開具詳細店號地址，來函接洽爲禱。

本雜誌以後每逢一日發行。定閱全年國幣二圓，半年，國幣一圓一角，郵費在內。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謹啟

北平西城石板房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記者

中國到了今天的樣子，究竟病根在那里呢？有人說是人民程度不够；有人說是軍閥鬧的厲害；有人說是受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而我們看來，這些話亦可以說是都對。不過這些都只是症候而不是病，譬如肺癆症，其症候是咳嗽與發熱等。但却不可把咳嗽與發熱就認為病即在此。所以專醫咳嗽，僅治發熱是醫不好肺病的。換言之，即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是由於未曾認清病根。對於中國的情形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們不妨暫且迴溯十年以前的情形，拿來對照一下。試問當時軍閥鬧得有今天這樣厲害麼？沒有。試問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有今天這樣厲害麼？沒有。人民程度比今天好麼？未見得。然而何以人民程度稍進，乃反而軍閥更猖獗得厲害，外國經濟勢力更壓迫得厲害呢？換言之，即何以愈是有些人們明白軍閥的爲惡，而反愈見軍閥猖獗呢？何以愈是有些人們知道外國經濟勢力的可怕而反愈見外國經濟勢力更侵入一層呢？可見這些都是症候而不是病根。要明白這個道理，我們須得換一個方面來說。即試問中國所最急需的是甚麼？往往病之所在，就是缺憾之所在。缺憾之所在，就是需要之所在。問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甚麼即不管問中國今天的病在那里。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明瞭的回答，就是說：中國所最需要的就是在於造成一個具有近代式政府機能的民族國家。我知道有人一聽這句話必定反駁道：你們所主張的乃是倒果爲因。因爲近世國家的成立必在剷除了軍閥以後；必在推倒了外國經濟勢力的壓迫以後。現在就講近代式國家的造成，豈不是倒果爲因麼？我們敢說我們的主張決不是倒果爲因，而論者這樣的論調却正是倒因爲果。何以言之？仍拿肺病來作比喻。試問醫肺病是否必須把細菌先殺乾淨麼？可見醫病與醫國原無二致。決不是單純專從排除障害一方面着手。現在的人們不明此理，一味高呼「除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實在是把事情看得太有段落了。老實說，肺病的治愈就在於患者的抵抗力。抵抗力增加一分則病便減退一分。本來沒有分明的段落。抵抗力是漸漸增長，而病亦是漸漸減去，所以革命不是救國，而只是救國的開始。無論那一個國家從沒有革命立刻即如由地獄而昇至天堂的；惟有看以後的施設如何。所以我們以爲這個救國的序幕是否仍不能不爲一種革命，現在暫且不談。因爲革命的需要與否完全看環境而定。環境必須要革命，自然是不能避免，亦不必避免。環境不需要革命，又何必硬要如此呢？因此現在不談這一層，而直接來說一說近世式國家的形成。

倘使有人問我：中國甚麼東西最壞？大家都知道中國比不上外國的地方太多了。武器不如人；人家有大砲飛機；我們只有步槍與大刀。但在我們看來，步槍與砲究竟還是五十步之

與百步。所以中國雖事事不如人，而就中最不如人的却可以說是政府。因此我敢回答這個問題道：中國最壞的東西就是政府。於此所謂壞不是有甚麼道德上的意義，乃只是指其失却職能而言。

譬如一個人的身體，目司視，耳司聽，腦司思，腿司走。倘若目猶能視，耳猶能聽，腿猶能走，而可惜獨有腦不能運用，這便是腦中樞失了其職司。可以說是腦壞了。中國的東西固然條件不及外國，然而尤其和外國不能比較的是所謂司中樞命令的政府。中國的政府最壞下自今日始。現在的政府固然是最壞的，然而以前些政府亦同是壞的東西。中國迄今未曾產生良好的政府就是中國所以直到現在不能立於世界各強國之林的唯一原因。

中國從來沒有好政府，這個事實不但爲中國人所公認，並且亦是外國人對於中國所下的公評。須知一個國家假使其政府不行，則等於一個人其腦中樞不行一樣。腦中樞不行的人雖然有健全的四肢亦沒有用處。這一次的對日作戰更證明了這個道理。兵士以大刀來肉搏，這種不怕死的精神真可佩服。小販走卒婢女車夫都肯把他們血換來的錢捐了出來，情願自己受饑，這種愛國精神求之歐人亦不多見。然而最後的結果却與事實絲毫無補，依然是一場空。可見人民好是等于健全的手足；倘使沒有好政府便等於腦中樞壞了。

其實這個非改組政府不可的理由在清末早爲人們所見到了。於是有立憲運動，有革命運

動。無論立憲與革命，其目的是一樣的。都是想把古代式國家變為一個近世式政治的國家。換言之，即想把未形成國家的變為具有近世組織的國家。但不幸得很，他們都失敗了。他們失敗的原因在那兒呢？當然各有各的原故，並且原因複雜。不過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他們把政治的改革看得太容易了。

因此乃有一種反動：就是有人以為從政治下手來救國是勞而少功的；不如從別的方面下手。於是有文化運動，有社會運動。有人專事於教育，以為教育辦好了，政治就會有辦法。有人致力於思想，以為非變化中國人的人生觀不能有救藥。其實事實是很顯明的。苟其政治辦不好，其他一切社會事業亦必沒有一件能順利進行。所以避去政治而不譚乃是一種國民的病態。我們決不能因為累次的政治改革都失敗而遂謂此路不通。不談政治的人們儘管自己不去干與政治，而實際上政治的影響却天天來強加在身上，致不能不感苦痛。這可說是：你要避他；他偏來惹你。我想這幾年來，無論在商界，在教育界，在農，在工，所有人們必都是感到這樣的切身苦痛罷！可見無論幹任何社會的改造運動，而政治的改革必不可缺的。多少年來的苦痛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使我們知道人在社會生活是一天不能離開政治。與其避開却不如大家硬起頭皮來，去闖過這個難關。老實說，政治一關倘使過不去，一切社會事業亦就休想有辦法。

自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成立以來，國人的政治慾更受打擊。除了鑽營無政治活動；除了上條陳無政治言論。這樣是比專制的清朝還有些不如。使全國人寒息，幾于悶死。在這樣的沈悶空氣中，只有驅失業的老百姓挺而走險，變為匪徒；使血氣方剛的青年抱憤世之心，流入左傾。於是社會的舊組織日益破壞；最初不過是幾個大埠，現在却已遍及窮鄉僻壤了。乃形成所謂全國的大混亂，真可說是浩劫臨頭。可見政治不良，其結果必致全社會蒙其影響。倘長此聽其自然下去，則所有社會的基礎，縱使有數百年文化作其根基，然而亦必終久為惡政治勢力所摧殘無餘。我們雖痛心於國民黨執柄以後政治的加速度腐敗，然而所以有今日這樣的慘局却不能不說是由於歷任政府的惡政所積漸而致。

到了今天，中華民族已迫於死生存亡的呼吸關頭。亦可說是到了最後一次的掙扎。我們看到這一點，同人等都抱有死而後已的決心，願來依着這個潮流掀起一個民族復興的大運動。在這個民族復興運動，我們尤注重在政治一方面。因為我們相信民族復興的運動雖是多方面的；然而却不可不有些聯絡與分配。政治是甚麼？照近代的學說來講，社會是爲了個人有種種不同的慾望與需要乃才有種種不同的方面與職能。政治的功用就在於調劑這些社會的職能，而爲之安排，爲之布署，使其統一，使其聯絡。一班耳食之徒，謂政治是治理衆人之事，真是荒謬得可笑，淺薄得可憐！所以我們以爲民族復興是一個包括多方面的運動。必須有

文化運動，從事於新思想的創造。必須有社會運動，例如如何推行平民教育與如何改進農村；又必須有關於國民經濟的運動，例如如何推行合作組織與如何使勞動者得有相當的產權。但須知於這些以外，却不可缺少政治的改革。因為沒有政治方面的工作，則一切運動都失了綱領。須知惟有政治可算是一個最高的推動力；一切才能提得起來。所以我們願意在這個民族復興運動的公同努力上特別提出政治改革的運動來。

此後我們要甚麼樣子的政治？從前政治改革的失敗是把政治看得太狹義了。以為頒布幾條憲法就可以有辦法。現在我們應得知道政治的改革實在就是一個國家的建立。好像一個生物的有機體一樣，其中樞機關的組織即等於全部身體的構成。所以我們今天所最急需的固然是好政府的成立，然而好政府所以能成立的條件却必是由於國家同時能像一個國家樣子。可見建立好政府的努力必即是建立一個像樣子的國家的努力。二者是沒有區別的。

現在更說得深切一些。大家應知道爲甚麼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成爲一個國家的樣子。從政治方面講，就是因爲政治的組織始終沒有成爲民主的。民主政治不僅是許多政體中的一種，乃是現代國家所以能把民族搏成一體的唯一政治組織。就是說，一個民族不想搏成一體則已，如其不能不成爲一體，則除了採取民主政治外，實無別法。在這樣競爭的世界，一個民族不想自己搏成一體，依然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中生活，其結果無不爲他種民族所吞併。

這一次的對日事件更爲好例。日本以整個兒的國家之力以謀我，而我則中央與地方相猜忌，人民與軍隊相猜忌，以一個地方的力量來作假面具的應付，又安得不敗！人家是一個健全的有機體，意志統一，一舉一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我國則好像一個癱瘓的人，各部分除漫然自己亂動以外，絲毫沒有聯絡與統貫。以一個健全的人來打一個癱瘓的人，還有甚麼話可說呢！所以中國今天以後只有一個問題：就是能否成一個國家？倘使不能，不但亡國，恐將滅種。

然而要成一個國家却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就是因爲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所有人民的意志，縱使有種種不同，亦能相劑相和而統一起來。人民的意志有了統一，才發生所謂民族自覺心（即民族意識）。所謂民族自覺心就是說人人自己知道是屬於這個民族中的一份子，其個人利害與全體的利害完全一致。好像在一個人身上的眼睛與耳朵，自己知道是眼耳。應當爲了身體去盡他的職司，果真人在國內都自己知道國家的利害，就是國家的利害；自己對於國家就好像四肢之對於全身一樣，則必能於彼此互相間相親相愛，實行互助。即古語所謂「全國一心」是已。可見現代用語是民族意識；舊式說法就是萬衆齊心。

須知這個萬衆齊心是不能勉強的，專制政治把人民壓迫到非跟着政府走不可。似可說大家一條心了。然而大謬不然。專制政治在平時表面上好像政府對於人民是一呼百諾。所以指

揮霍如，頗似一體。但一旦遭遇國難，便會立刻現出破綻來。所以民治的國家與專政的國家是恰恰相反。民治國家在平時好像是議論紛紛，一日遇着外患，必能各方捐棄意見，形成一個一致對外的局面。專制國不然：在平時人民只是唯唯諾諾，並沒有異議可以發生，好像是很統一很順利的樣子；然有遇着非常則內部所久已潛伏的利害不一致便藉此爆發出來了。所以專制國經不起外患的壓迫。一有外患，不是內部自起革命，就是從此亡國。

可見國家的統一與其政治組織是有密切關係。質言之，即政治制度如其採取專政，則國家的統一必不能永久。中國在前清時代本雖是統一的，然因為外國勢力的侵略終必出於革命一途。革命以後可以說二十餘年以來，就從未真正統一過。人人都知中國要成一個國家樣子非先辦到統一不可。而殊不知要辦統一非實行民主政治不可。歷來政府的武力統一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國家的統一與政治組織有極密切的關係。

須知國家一辭在古代與近世雖然是一樣，但其意義却已迥乎不相同了。以前的國家，誠如馬克斯派所指摘，乃是一個統治關係的組織。現今的國家却是文化相同言語相同利害相同血族相同的一羣人們所組織的自存團體。因為世界上的人們爲了謀自己的生存發展起見，大家都不約而同分頭組織起來。以血統與地域爲單位，以文化與言語爲單位，以利害與歷史爲單位，都團結起來，以致地球上只有民族，沒有個人。個人與民族相遇，好像一個孤身的人

遇着一個有組織有訓練的軍隊，其不能相敵是三歲童子所能知的了。所以未十分搏結的民族等於各各散立的個人，勢必到處都是吃虧。在這個大勢所迫之下，無論你情願不情願，凡是想生存於今之世就不能不編入于這樣的民族團體中。所謂民族主義即指一些族類大概相同的人們自己起來組織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言。乃實在是事實所推演，並非心理作用。換言之，即大家如此，我們爲了競存起見亦不得不如此。

中國此後當然非走上民族主義這一條路不可。這亦不是由於任何人的主張，乃正是事實所驅使。不過明眼的人可以預先看明這個趨勢，作一些指導工作罷了。中國既非自趨於民族的搏結一體不可，既非由民族的一體而組成獨立的國家不可，則於所以致此之道使不能不加以研究，於此便可見民主政治的重要了。老實說，中國人對於民主政治實在有誤解，總以爲民主政治就是議會政治。其實民主政治的精髓只在政府的政策是否即代表民意與政府的利害是否與人民一致。倘使其不一致，雖有國會而仍不足爲民主政治。倘政策就是民意，則無論何種形式的政府都是不背於民主的精神。我們根據這一點來討論國民的統一與民族的自覺。必可以看見凡是政府的利害與人民的利害不一致的，決不能辦到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自覺。因爲這樣的國家不是一個自行團結以謀生存的團體，乃只是一種不自然的統治關係而已。例如現在的國民黨專政，其處理對日問題便可證明。國民黨的利非全國人民的利而國民黨的害

又非全國人民的害。這種情勢之下居然國民猶自忍辱負重，充分表示愛國舉動，已真是難能可貴了。不能不說是知大體。然而在這樣情勢下，使人民油然而自生出民族一體的觀念依然還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就在有個出氣筒。平時這個筒可以出氣，所以一到非常時反而能够一致與固結。專制政治沒有出氣筒，在平時本來是悶得要死，一旦有了奇變，勢不能不立刻炸裂起來。換言之，即良好的政治的貴乎在于有宣洩處。有宣洩處方會有伸縮性。有伸縮性方會有適應性。這便是所以近世的民族國家在原則上在精神上未有不是民主的。

要之，所謂近世國家，所謂國家，所謂民主國家，只是一個意思。未有近世式的國家而不是由民族一體的自覺而組成的。未有民族所成的國家而不是民主的。所以三個名辭却只是指一個事物。這一點恐怕是中國歷來論政的人們所最忽視的了。

以上所說民主國家似乎只注重在說明國家機關的意思方面。其實，大家知道中國的政府是最壞的東西，不僅指意思發動一方面而言，乃把行政執行一方面亦包括在內。關於意思發動一方面，我們以為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是建築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與「人同此心同此理」兩句話上。至於多數表決與代議機關不過是表現之具而已。千萬不可本末倒置。所以民主政治只是一個精神。凡合乎這個精神的無論表現到何等程度都可謂為民主的。例如黨政

府所召集的國難會議：會員由政府聘任固然不是民主的；然而會員們的主張却不是政府的意見，不能不說是有幾分代表人民。明白了這個道理，便知道民主的與非民主的之辨別在於實質，不僅在於形式。

至於執行方面，須知近世國家的政府完全是一架極敏活極有效率的機器。所有政府人員不過是機器中的一個釘與一個輪而已。這一部分一動，那一部分必立刻隨着而動，好像一架紡織機器；只須把棉花投進去，自然會紡成線，又自然會織成布。因為機器中的各個機械都是互相銜接的。此動彼應，成爲一個整套的活動。近代國家的政府無不是變爲這個樣子。說得淺些，好像大商店的組織一樣。其中製貨，發貨，定價，計賬，陳列等等事務等於一個機器中的各部分，此動彼應，互相聯絡。商店爲了競爭營業起見，不得不趨於這樣機械式的組織化。政府爲了行政效率起見，爲了競立於國際上起見，亦就不能不趨向到這樣穩定而敏活的組織。

但是中國迄今所以未形成近世國家的緣故，亦就是因爲中國的政府從來沒有成爲這樣近世式的組織。政府既不是近世式的組織，則自然決不能實現近世式政府的功能。中國政府本久是私人可以隨便處分的。清代雖然淺陋，然尚有古代式的制度。到了民國，差不多無制度可言。既沒有固定的制度，又安能有敏活的組織。天津某報評論，說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組

織法在一年之內修改過四次，引爲怪事。其實中國自始就沒有組成近世式的政府組織。所以無論任何機關，一件小事亦得壓擱許久；非賄賂不行；用人必是親戚朋友。這樣的政府好像一支破船。一遇外患，正是破船遇着了逆風巨浪，安有不沈之理！

我們拿近世式的政府組織譬之如一架機器，然而須知機器是非時時擦油不可；否則即會停滯。政府的組織必須具有防止腐化的功用。就這一點而言，政府又好像有機體了。有機體自身必須具有防疫素。不然便會自己中毒而死。政府亦必有防止自身腐敗的作用。不然便自己腐敗下去。可是中國的政府正好像一個有機體而沒有防疫素一樣。報載南京政府的監察院有一千數百件彈劾案從未見執行。這就等於有機體內防疫素不生作用一樣。又難怪國民政府的貪贓枉法高出以前軍閥時代百倍呢！一班人往往看見貪贓枉法總以爲是人的不行，殊不知這乃由于未建立制度所致。我們相信假定政府的組織亦和大商店一樣，則舞弊的事情自然可以用制度的力量來防止。

總而言之，我們最痛心的就是中國迄今尙未曾有政治家替國家建立一個牢固不拔的制度。一班浮淺之徒只知道革命。於是革命之後又繼以一個革命，結果成爲循環革命與連續革命。須知倘使一個國家終日在「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討生活，則這個國家未有不精疲力竭而死的。可見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而只能限於一次。一經革命以後，必須替國家立

一個萬年有道的常軌。可憐中國今日尚在循環革命與連續革命之途中。我們的努力就是在於要打破這個局面。

我亦知道必定有人說：以前的臨時約法何嘗不是一種制度，現在的一黨專政又何嘗不是一種制度呢？須知制度是公的，不是可由少數人隨便造成的。倘不明此理，一部分人或一二入要以其私心私慾變為全國的制度，這便是所謂「私慾的制度化」。這種私慾的制度化在實際上等於無制度。縱使能維繫一時，而暗中依然在那里製造紛亂，結果是終於破裂。可以拿私慾來造制度便是在那里製造革命，醞釀混亂。袁世凱的工作是這樣的工作；北洋派軍閥的工作亦是這樣的工作；現在國民黨依然在那里作這樣的好夢，我們以為中國不欲自救則已，否則必須改途易轍。

何種制度方能為消弭革命的呢？這不消說，就是有一種制度而其中必須包含有自由與平等。自由是屬於個人；平等是在個人間的社會關係上。但為便利起見，亦可分為經濟自由，政治的自由與文化的自由。經濟的自由即是經濟上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在歐美實在發展的太過分了。所以現出偏枯而不自然的歧形來。這便是世人所公認的資本制度之流弊。政治的自由即是所謂民權。文化的自由是思想自由與學術獨立。我們以為這三種自由却以文化的為其根本。政治上民權乃只是思想自由的表現。倘不許思想自由而只許人民以投票，這個

便不是自由。現在一方面厲行黨化教育，而他方面却要想召集國民大會，其為侮蔑自由真義實不待言。所以我們以為將來制度要當以思想的文化的自由為根本。至於經濟的自由不妨使其縮小；政治的自由亦可因時代的要求而稍有伸縮。獨有這文化的自由是立國之本，絕對不許絲毫折扣的。

平等亦可分為經濟的平等與政治的平等以及文化的平等。經濟的平等即是所謂生存權。政治的平等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文化的平等就是人人須得有同等機會的受教育權。歐美在經濟上個人主義太過分了，所以於經濟的平等實是有虧。因為經濟的不平等乃產生政治的不平等。原來歐洲民主政治原是站在所有一班人民之上的，迨後來因為經濟的變化，把人民演變為有產與無產兩大概，而對於民主政治遂致無產者失其利用的機會。我們應得預先看到這種勢所必至的流弊。而先設法注重於經濟的平等。苟經濟上不致於變到不平等，則政治的平等只須靠有一個合理的制度便可保持。至於文化的平等更不待言。人性本來不齊；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斷無法把人的智能弄得大家一樣。所以文化的不平等只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苟經濟上使其無甚大的不平等，則文化上縱有差異亦不足為患。因此我們對於平等以經濟的平等為着眼點，正和思想的自由為他種自由之根基一樣，經濟的平等亦是其他平等的來源。

但自由與平等不是沒有等級的。換言之，即都是可以有伸縮性的。但却不可縮到極小限度。所以這二者須與政治的効率相配合。有時爲國家的行政想提高其効率，便不能不對於個人自由在相當範圍有所減縮。有時爲保留個人自由以存國家的永久基礎起見，對於行政的効率亦就不能不在相當範圍內有所遷就。有時國家爲保持社會平等起見，當然可以稍稍限制自由。而有時爲了自由是人性的根本要求，亦就不能不把平等作到相當程度而止。所以我們不主張廢除私產，是根據這個理由。我們不主張自由競爭的生產法亦是根據這個理由。我們不採取放任主義更是根據這個道理。

我們相信只有這樣把効率，自由，平等，三者配合得各到相當程度的制度方能成爲永久的制度。不然，倘使其有虧於個人自由，則終必顛覆。所以專制國家決不會長治永安。至於有虧於平等亦必是破統層出；縱使時時修補，亦未見得渡過難關。近來各產業先進國遇着了空前的經濟困難就是爲此。其結果或演成社會革命，要未可知。所以中國在今天宜於一方面以現代正在困難中的資本國家爲殷鑑，他方面又宜以古代所有已失敗的英雄政治專制國家爲戒鑑。否則便是求治而反益亂；求立制度而反以毀制度。

這樣的制度一天不成立，中國便一天不能成爲近世式的國家。我並不是說現在各強國都是採取這樣的制度。但我們必須知道各強國其所以能強盛的緣故，就在於他們的制度中至少

總有些是包含這個原則的。不過其配合的程度各有不同罷了。有的是效率獨強，而自由較小。有的是自由過大而平等甚小。但無論如何，這三點中却不能有一點減少致等於零。這便是他們所以能維持不敝的緣故。

至於今天的中國却大不然。人民何嘗有自由，社會何嘗有平等？豈者反而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了。殊不知這只是放縱，安可與自由相提並論？可見作此說的人實在不知自由為何物。因為自由是積極的意義而不是消極的意義。還有人說，自由只可用於國家不可用於個人。此說亦是把自由與自主相混。國家在國際間所爭的是獨立，所以是自主，是自決，而不是自由。須知一個人在社會上國家內有法賦的自由並不是指他有自決的權利而言。可見二者確有區別。所以中國不但在制度上從來沒有夢見自由，即在思想上亦從來沒有夢見自由。至於平等與效率更不必提了。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所主張的近世式國家，在名詞上在表面上或許大家不覺得有甚新奇，倘天假以良緣，一旦實現，我敢說必是和現狀有天淵之別，可以說完全是的一個新的東西。素來為我們東方所缺少的。不過這個新東西却為人類圖存所必需的了。那一個民族不具有這個東西便終會被淘汰而滅。所以我們中華民族對於這個新東西的採取與吸收不是情願與否的問題，乃是為事勢所迫而不得不然。這一點是大家必須了解的。

我們根據這個意思可以討論現在的國難。自從熱河不守平津停戰，表面上日本問題似乎告一段落。於是有人便提倡充實國力。所謂充實國力就是大擴充軍備。更有人作軍備救國論，以爲一切皆可從緩，惟有急急購飛機，造大砲，練新兵。我們却以爲國家沒有成爲近世式以前，縱使有了近代的武器亦必是不能用。弄得不好，或許反而資盜糧，亦未可知。因爲近世的軍備和近世的國家組織是分不開的。斷乎不能以古代式的國家機關而可以運用近世式的戰具。所以在國家組織未改造以前，所有的新式軍備都等於一大宗浪費；同時又是一大宗榨取。在外國不過得了些買賣；在人民却拋了無數的汗血。因此我們主張必先從國家建立起來，即把中國改爲近式的國家以後，方可以談雪恥。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在現狀上想作報仇的工作，其結果恐怕反而在恥上添恥。所以今天我們不是不可講雪恥與復仇，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必須把這樣的不成國家樣子的中國先弄成一個國家樣子。

所謂近世軍備與近世國家組織有密切關係，乃是指近世戰爭已變爲民族全體力量的對拚而言。這個民族如其智力財力組織沒有變到近世式，依然是古代的樣子，雖有新軍械亦必不濟事，根據這一點使我們知道所謂建立近世的國家實包含多方面。即不僅是於政治上須有一個新的制度，而並且於經費上必須有建設，於教育上又必須定有方針。又不僅如此，而政治的制度和經濟的建設與教育的方針又必合在一起，拚成一個整個兒的。換言之，即這樣的政

治制度必是有助於這樣的經濟建設；這樣的經濟建設正需要這樣的教育方針，這樣的教育方針乃能運用這樣的政治制度。這樣成爲一個整套，在這個整套上不僅對於當前是可以運用自如，並且必是對於未來有發展的希望與可能性。我們以爲中國所需要的經濟建設必是生產的。換言之，即必須是十二分注重於增加國民經濟的生產力；而同時又必是社會的，換言之，即必須爲社會公共的幸福而調劑私人財政的偏枯；又同時必須是計畫的，換言之，即必須把已有的各種產業置於統制之下，而對於以後的造產則預定有計畫。詳細說明，另有專篇。我們關於教育以爲今後的方針必須是注重於增進人民的生產能力，養成共同生活的道德與習慣，使人人都有民族自覺心。我們相信唯有這樣的教育方能貫徹這樣的經濟建設與政治運用。自當由另篇再爲說明。

總之，這樣是一個造國的運動，亦可以說是廣義的政治運動。根據最高理論上若干基本觀念，例如民族一體，個人自由，社會平等，政治效率，來改造全體的國家，務使其全盤如一個有機體，能運用自如。如此方能對外。這樣便是民族復興的正途。除此以外，概爲魔道。中國今天已到了非生即死的最後期了，一邊是正途，一邊是魔道，究竟何取何擇，不能不求大家細細地想一想了。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

張君勱

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十四年間，因為我在清華大學的一篇講演——「人生觀」，引起了國內學術界之大爭論，參加者二三十人，各人所做的文章，合計有七八十萬字，並且有兩種集合的出版物，一為「科學與人生觀」，胡適之先生集，上海亞東書局出版，一種叫「人生觀之論戰」，是我自己所集，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這件事到現在正是十年，似可以替他做個紀念，假定政治上國家的開國是值得紀念的，那末，思想上的爭論，我自己是個參與的人，也應該回顧一下，其理由有三：

第一、考察自己所說的話，十年前與十年後有無變更或錯誤，此點在下文名為「自己的回思。」

第二、考察同我辯論的人給我們的是一種什麼印象，從他們的言論，看到他們在現代思潮中派別是怎樣，此點下文名為「對於國內同時代人的思潮之感想。」

第三、對於思想界以後所應開展之路徑該怎樣？此點下文名為「學術界開展之途徑。」

第一、自己的回思 當時我的題目叫「人生觀」，實在自己要說的話，就是人生 (Human Life) 與自然界不同之點何在？當時我說了好幾點：(一)科學是客觀的，人生

觀是主觀的（二）科學爲論理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三）科學可以用分析的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爲綜合的，（四）科學爲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爲自由意志的，（五）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的單一性。我當時腦子裡所有的「科學」二字，實在是指自然科學，不是指全部科學，因爲自然界才能同人生對立來說。假定有人來問我「是不是對此五點，還是堅持。」我可以明白答覆，這種明顯對立的說法，我自己也不一定認爲滿意；但是，根本上，人事界與自然界兩方之不同，這點我現在仍然絲毫沒有變更。現在不用我自己拿一種說法來說明人事界與自然界之不同，我姑且借用美國學者柯亨（Morris Cohen）的一篇文章——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里面所說明的社會科學之特點來說明：

- 第一、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是意志的行爲與價值判斷，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爲因果關係。
- 第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爲具體的歷史的事件，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爲自然界的事件中之抽象的或重複的情形。
- 第三、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爲文化或社會的傳統習慣，自然科學則與文化，社會傳統，毫無關係。

柯亨氏又提出一個問題——社會科學公例之有無問題。他曾說，社會現象中即含有許多相同處（Similarities），但不能承認相同點就是公例。他並且說，社會現象，儘管是受因果關

係的支配，但在有限的時間上從有限心靈方面說，不能說他呈現什麼公例來。（“Social phenomena, though determined, might not to a finite mind in limited time display any laws at all.”）

他又說，假定有人以為社會科學與物理學一樣，能發見許多確定公例，那麼我請他們替我們編成一本「社會科學公例表」，拿這社會科學公例表與自然科學公例表，互相比較一下，看看他們數目的多少，公例的確定性如何，公例之普遍的表徵性如何。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社會科學內的公例，萬萬趕不上自然科學內的公例。

柯氏這篇文章說社會科學中無公例，也猶之乎同我所說明的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是一樣，但並沒有聽見美國思想界罵他看輕科學，罵他是玄學鬼，這是什麼原故呢？這也許是中國和美國兩方學界術空氣的不同罷了。中國和外國接觸後，我們最驚奇的，就是西洋的科學，心目中的所謂科學，乃是飛機，大砲，輪船，電話，無線電等等實用的東西，高一層的就是知道有所謂科學方法，或者說拿出證據來。在這種空氣之下，有人來說人生問題不受科學支配，人家就疑心他（一）是反對科學（二）提倡玄學（三）反對西洋文化的了。其實這是一種思想的幼稚病。

我當時所以提出這些問題的理由，可以分三點來說：（一）中國接受西洋思想，西洋科

學年代，也不爲不久，這一點說，從曾文正文、文襄李文忠在上海設製造局，在福州設船政局起，近一點說從戊戌後，各省設大學中學起，我們接受科學，至少有好幾十年了，我們應該拿一種反覆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的精神，和批評的精神來想一想科學本身是什麼。科學的本身，就是知識，知識的對象有兩種：（一）自然界（二）人生界。屬於自然界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植物諸學，屬於人生界有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最後還有一種不容易分類的心理學。這種科學中，何以天文學物理學的公例最可靠？生物界公例比較的可靠，關於人事界的公例之可靠性太差？假定我們的思想家肯從這方面研究，然後能認識科學之真性質公例之真性質。這種問題，西洋人也會有人提起過，但是我感覺他們還沒有系統的說明。（二）科學這件事是關於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知識，雖然他們是同樣的知識，但這裏面有個大問題：一方面是自然界，這裏面公例爲必然性所支配，一方面是人事界，人類是有意志的，是有自由的，既有意志有自由，所以他的內容很複雜，不容易查出公例。我現在不是說人事界里面一定是自由，物理界一定是因果的，乃至於說惟其是自由，所以科學不能發展，惟其是因果，所以科學的工夫能做，要知道康德是提出這問題的人，其他與康德抱大同小異的意見的也不少，我那時提出這問題，不過是拿人家的老話，重說了一遍並不是我的創見。（三）科學既是知識，譚到科學，就不能不譚到科學之前提，（甲）人類何以

有知識？知識是外界事物本身的公例呢，還是人類精神的產物呢？（乙）科學所以稱爲科學，因爲他能發見公例，公例發見，又以因果關係爲前提，何以自然界中因果關係能支配一切，而人事界中不能？這種問題，在西方科學發達的國家中討論已久，我們萬不可不問不問而終於落人之後了。

以上三點，是我提出人生觀問題的時候同時聯想的三件事，想從這三方面起，可以使我們的思想有一種目標，大家可以向前進行，或者我們的思想史上，可以開一個新局面，換句話說，我們不單接受西洋科學中之現成結果，同時我們須能够對於科學本身，或者說對於科學的前提，加以思考，加以批評。這一點願望，可以說在以往十年中，很少實現，並且很少有人向這方面做工夫。

在我的自己的回思里面，有一句話要聲明，就是我對於科學的態度。科學這東西是十六世紀以來歐洲的產物，也是人類的大發見，關於天文，關於地理，關於物理化學，關於生物學，這其中發現許多的秘密，爲人類一千多年來所不能想像的事，世界人類既因科學進步而大受益處，尤其是中國人幾千年來不知求真，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識的國民，可以拿來當作血清劑，來刺激我們的腦筋，趕到世界文化隊里去，中國唯有在這個方針之下，才能復興中國的學術，才能針砭思想懶惰的病痛。我說這種看重科學的話，並不是要我們國民單接受西

洋兵艦，飛機，無線電就算了事，是要我們國內科學家能够做牛頓，能够做愛因斯坦，能够做達爾文，換一句話說，是自主的科學思想，不是受動的科學思想。（康德指導哲學中之問題，是數學何以可能？自然科學何以可能？形上學是否可能？我們受過康德的洗禮，是不會看輕科學或反對科學的，請老友在君放心罷，我但恨我不能在地質調查所或物理實驗室做科學隊之一員，至於真疑我來反對科學，真可謂「莫須有」了。我近來很想在歐洲各國調查其科學發展之成績，以爲我國借鏡之資，已詳學術界方向一文中，不在此細說了。）

第二、對於國內同時代人思潮之感想 回顧當時參加者的論文各人主張不一，有調停派如梁任公如范壽康輩，其中最能代表中國這個時代的思想，可以說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第二篇是胡適之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文集的一篇序文，第三篇是陳獨秀對於論文集的序文其宗旨在提倡馬克斯唯物史觀。在這三篇文章內，表現他們的思想，吳稚暉是一個素樸的自然主義者，他自己說，世界的開展是一個黑漆一團的宇宙，他說世界上不外兩種東西，一種叫「質」，一種叫「力」，這種話與十九世紀中德國的布希納（Buchner）赫克爾一鼻孔出氣，在這種承認世界上只是質與力的人，此宇宙現象是很簡單的，不過質與力的變化，何以從質與力而能達到生命，何以從生命又達到心思，這種複雜的問題，在他們看來，都可以拿質與力來解釋他，人家所認爲最困難的問題，在

他們看來，簡直沒有問題。布希納的書在德國銷行二十餘版，現在這本書很少有人提起了，自然吳先生黑漆一團的宇宙，在我們現在思想幼稚的時代，也當然是應該有的一篇文章。

胡適之在他的序文里提出好幾條新人生觀：

(一) 根據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窮大。

(二) 根據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長。

(三) 根據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四) 根據生物的科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五) 根據生物學，生理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的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

(六) 根據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

(七) 根據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

(八) 根據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

可以用科學方法尋求出來的。

- (九) 根據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是不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 (十) 根據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在這些條文看起來，他不是一個杜威的學生，而是十六七世紀時之自然主義者了。當十六七世紀的科學哲學家都以為「自然」這名詞，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有所謂自然公例，自然狀態，自然宗教，自然權利諸說，在當時天文、物理學發達，在此純粹的自然界中，既經有如此的好成績，自然有人拿這方法推廣到人專宗教方面去。所以當時宗教方面，不相信舊來的神學而相信自然的宗教，在政治方面，推到國家成立以先之狀態，名之曰自然狀態，而有所謂社會契約論，自然權利等說。這種思想在當時想推倒舊傳統宗教，推倒舊傳統政治，當然是種好處，但拿時代來說，我們現在生在二十世紀，我們是不是應該拿歐洲十六世紀的思路，再重複一下，回到二十世紀呢？還是我們拿自然主義限之於純粹自然界呢？至於社

會人事一方面，另外求一種解釋去解釋呢？換句話說，自然主義，或者說自然界所適用的機械主義近年在物理界內因新物理學發生已經搖動，人事界內更不用說了。所以我看胡適之先生的思想，是在採取自然主義以排除迷信排除舊習，與伏爾泰（Voltaire）一輩之宗旨，完全相同，胡先生之滑稽文，更與伏爾泰相似，至於這種主義不能解釋宇宙一切現象，胡先生都把他忘了。

陳獨秀序文的意思是借科學與玄學的討論來提倡唯物史觀。他認為所謂自由意見，所謂個性，所謂道德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原來馬克斯的話叫唯物史觀，就是說歷史變遷的原因在生產關係，而不在內心的思想。生產關係是下層構造，道德，學術，政治是上層構造，上層構造不過是下層構造之反射，用這種方法來說，自然是思想不足貴，道德不足貴了。他們的最後一句話是階級鬥爭，認為全部歷史不過是階級鬥爭的發展。老實說，這種學說之動機，不在成立一種學說，而在促進社會革命，所謂思想，所謂道德，在世界上本來是種很根本的現象，在他們看來，變為生產關係之附庸，所以陳獨秀說：你們提倡道德，不知道南洋野蠻民族，有因為父母年老，拿父母拋在野地，讓野獸去吃的事。在我們因為人類有道德，所以愛護他，發展他，他們看來，道德不過是強有力的階級壓迫弱小階級的工具。如此說來，階級性成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學說不同的張本，其結果不過是互相謾罵一番，那里

是談學理？大家知道馬克斯是最善於罵人的人，他罵英國的邊沁（Bentham）叫他爲十九世紀普通資產階級理智的預言人，罵陸克（Locke）爲新資產階級之代言人，其他類乎此者，不勝枚舉，所以假定他們辯，他們還我們一句話說：你們是資產階級，所以也不必同他們辯了。

從以上三個人的言論看來，和世界上他國思想歷史比一比，第一、可以比希臘宇宙思索的時代，還不是蘇格蘭底「知道你自已」的時代，就是他的目的還只有外界的宇宙，比之初期自然科學發達時代，還是在科學的實驗時代，自然界機械主義支配一切的時代。在這種科學剛開始之日，自然主義唯物主義也就跟來，譬如十七世紀英國有霍布斯（Hobbes）十八世紀法國有拉馬代（La Metire）霍布斯拿機械主義解釋政治，拉馬代拿人類當爲機械人。至於德國唯物主義的發生，較英法爲遲，因爲最初有萊比尼華（Leibniz）開創德國哲學，其後又有康德，黑格爾，菲希德諸人繼起，所以唯物學說一直到一八四八後才流行。我可以簡單說，自然主義唯物主義是各國思想界中必有的階段，在這階段中，一定相信物質是真的，思想，心靈是假的。但我們看來英國最普遍的思想，還是經驗主義，而不是霍布斯的唯物主義，德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唯物主義盛行後，接着就是回到康德的運動，於是新康德主義便發生了。在我們今日之中國，正是崇拜西洋科學，又是大家想望社會革命的時候，所以唯物史觀的學說，在中國能如此的流行，是不足爲奇的。但是我恐怕不到幾年以後，這種思想，也

要成爲過去的了。何以故呢？因爲唯物主義，表面上所爭的是物質是最後實在問題，實則所爭的並不是物質是否最後實在問題，他們的意思是要拿這種主義排斥傳統的宗教，排斥傳統的政治，排斥傳統的學說，換句話說，要在唯物主義中求新的生活標準，但是學術，宗教，政治問題，決不是物質二字所能解決，這是很明顯的事。所以，過些時後，在唯物主義者的自身，假定他的革命成功後，他就不再堅持這種學說，就是革命不成功，拿唯物二字解決一切學術，宗教，政治問題，是人類精神上不能滿足的，所以，過了一個時期，這種思想，便成爲過去的了。

第三、思想家今後開展之途徑

譚到以後思想開展之途徑，自然各人有各人立場，吳稚暉有吳稚暉的思路，胡適之有胡適之的思路，陳獨秀有陳獨秀的思路，各人的立場既然不同，他指出來的途徑，自然也不同。所以在我未指出途徑以前，先說明我個人的立場，要知道一個人對於社會提出一種思想，是對於青年，是對於學術有重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提出一種思想是有重大的責任，所以提出思想方針以前，自己對於提出思想的幾個前提，不能不想一想。

(甲)在橫的方面來說，應該問他的思想是否能包括宇宙中各種現象，譬如世界上只有物質，這個立場就不包括生命和心靈，再進一層來說，譬如說知道求真的重要，拿「真

「做學術界之最高標準，那不是對於「善」忽略過去。換句話說，就是忽略道德。所以提出思想以前，要問第一對於知識方面是不是偏重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第二是不是只知道有知識而忽略了道德方面。」

(乙)在縱的方面來說，假定一種學說但能適用於革命而不適用於普通狀態，這種學說，也就是偏於一方面的，譬如提出階級鬥爭說，對政治說固然能促進革命，並且拿歷史來證明，各國自然有階級之爭，但除了鬥爭以外，歷史上很有各階級能和平相處的時期，這一方面也是思想家不應該不顧到的。再換一方面來說，學說固然應該提出新穎的學說，但是我們祖宗傳下來的遺產，也應該有相當安頓的方法，因為思想是離不了各國的民族性的，我們無論如何要想發揮新思潮，終久是要回頭看看歷史上的舊思想怎樣，所以在縱的方面來說，我們要提倡一種學說是對於非常時期與普通時期，同時要注重，對於外來思想之輸入與夫舊思想的如何消化，整理，也應該同時並重。

在我們的腦子里，時常把以上兩個標準反覆思索，所以我的思想，不如國內其他思想家的辛辣和尖銳，這是我自己知道的，但我很清楚的認為思想界應負很重的責任，所以不能不鄭重點。

現在再回到本題上來說思想界開展之途徑，那麼有三點應該注意：

第一、思想力之培養。

第二、科學成績之追及與凌駕他人。

第三、哲學之不可忽視。

(第一) 思想這件事在唯物派看來，他是物質之附隨的現象，他們看來是不重要的，但是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自有人類以來如古代之鑽木取火，耕田而食，難道不是人類思想的發明嗎？近代的科學，工藝與技術之發明，又何嘗不是思想的產物呢？歐洲從十五六世紀以降，一直到現在，第一期的時代發明在天文，物理，化學，第二期的時代在生物，心理，最近可以說又回到天文，物理方面來了。這里面有多少思想家，科學家經過多少困難，具備多少精力才能有今日之結果，假定依唯物派所言，拿殖民地的發現，工商業的發展來說明這種科學成績之由來，換句話說，但依物質條件來解釋思想家之工作，實在忽略思想本身之威權，最明顯的，就是近年科學家之注目點在天下與物理，究竟由於何種生產條件之變更呢？歐洲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以來，有克魄雷 (Kepler) 格律雷 (Galilei) 牛頓 (Newton) 之科學，又英國有霍布斯，陸克等等學說，大陸上有笛卡兒，萊比尼之學說，這都是因他們思想的活躍，才有此結果，假定我們今後不在思想上求活躍之方法，那在科學，哲學方面，一定沒有進步，思想力這件事，時而注意一方面，時而注意那方面，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應該培

養他，訓練他，使他們認識問題，然後進一步能發現公例。歌白尼，因舊天文學之基礎而發見地動之說，克魄雷又以歌白尼學說為基礎而發見行星軌道橢圓說，乃至於康德折衷英國經驗與大陸派理性主義之學說，而有所謂批導哲學，可以說都是思想家特出的與創作的產物，假定我們不知道培養這種思想，而但叫喊「發達科學」，恐怕科學也是不能發展的。最近國際聯盟知識合作社，派科學家，大學教授等組織專家委員，來中國考察教育，他們回去以後，有一本報告書，有如下一段很重要的話：

「中國教育家之持論，每謂歐洲之所以有今日者，皆近代科學發達之產物，中國惟有採取各國中科學與技術的設備，而後中國之文化，乃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

對於中國教育家之言，吾輩一致之答覆曰：中國之持論謬矣，今日之歐美，非近代科學與技術所產生，反而言之，惟有歐美人之心思，乃以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且抬高此二者以達於今日之程度，在近代科學與技術發達之先，尚有若干時代，如文藝復興如理性主義與惟心主義時代，此各時代中歐洲人對於自身發展之可能，有所醒覺，且甘受一種理智的訓練，而後屆及創造與發明之時期中，彼等能把捉自然科學與技術之秘密，且應用之於最有益處。」

我們對於哲學有興趣的人，十年來拿歐洲哲學界過去的與現在的學說輸進中國，老實說

，並不單爲哲學，實在是想培植國民的思想力。先知道問題（Problem）所在，繼而求問題之解決，先認識問題，而後求問題之解決，不但哲學如此，就是科學，也是一樣的。國聯調查團說，惟有歐美人之心思，乃能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我說惟有中國人今後心思之活躍，乃能產生科學與新文化之活躍。

（第二）就科學成績來說，我們在今日之中國，是落人後的。我們乃倡爲凌駕他人之說，或者國內不免有人譁爲唱高調。我現在分兩方面來說：（甲）科學思想的發展，可以藥中國人思想界之「囫圇吞」和「差不多」的毛病，換句話說，科學家按集許多事實，與證據以後，然後生出一種學說或公例來，這一種對於研究工作之忍耐力，慎重力，與理智的忠實，實在是科學家的美德。胡適之關於這方面提倡力量最多，我們不應該抹殺他，乃至於設科學研究所，設科學講座，都是發展科學的方法，也是不容忽略的。（乙）但是我以爲要發達科學，不僅是科學家在試驗室或研究室的工作，應該找出科學發達的關鍵來，譬如法國的居維愛（Cuvier）曾經對於他當時的自然科學，加以歷史的考查，並且指出已達到爲何事，未達到者爲何事，所以我們的意思，像中央研究所應該拿一切科學如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社會等，拿他們已經解決和未曾解決的問題，列爲詳表，掛在各科學家的座右，使人家知道今後研究方向何在。我又聽見英國梅茲（Merz）說，科學精神，在法國十九世紀之初

，完全確立，後來德國將此種科學研究方法移到德國去，不及數十年，不但能和法國一樣，而且更能勝過法國，這裏面的內幕，我們應該調查，換句話說，我們應注意科學發展的總關鍵，而不應該單注意分門的研究。（第三）至於哲學的不可忽視，在我這演講中，可以說隨時有提到的地方，我現在重新再說幾句，科學的研究無論如何精深，總是一種分門的研究，一種專門化的研究，研究天文的人，不能再顧到物理、化學，研究物理、化學的人不能顧到生物學，研究生物的人不能顧到社會科學，因為他的工作是分門別類的。在研究物理的人，可以僅僅知道機械主義而不必知道目的論，在研究生物學的人，可以知道目的論，而不必想到自由意志之說，至於研究社會科學與理學，那就不能不知道自由意志的學說了。這三種學說——機械主義、目的論與自由意志，都是哲學家的問題，而不是科學家的問題，換句話說，科學家只能給我們以部分的宇宙觀，哲學家才能給我們以綜合的宇宙觀。哲學家的議論，好像是無中生有，好像發生種種無味的爭執，實在他是求宇宙內種種不同現象，指出他們背後不同的原則，告訴我們他們內部的衝突，而同時要我們拿衝突的學說，設法來調和，來安排，我們如其願意對宇宙的一部現象，不管他，拿他攔起來，那也罷了，如其我們不安於這種部分的宇宙觀，那我們非從事於科學之研究不可。胡適之先生曾經說過，自從物理學，生物學發達以後，哲學家的領域，為科學家所侵占，他的意思說，哲學家的飯碗已經打破，不能

再存在了。這句話可以說他完全不懂哲學的使命在那里，以後的中國思想家不但應該接受歌白尼，牛頓之遺產，同時也應該接受柏刺圖康德等之遺產。

最後還有一句話，就是知識與道德的關係。科學或注重科學方法之哲學家如英國羅素等人，他們注意於求真，而拋棄善的問題，他們惟認科學是真，是有價值，至於善的問題，他們不願意談。羅素曾經有一段話：

「人類是種種原因的產物，此種種原因，不自知其所欲達之目的爲何，人類的起源，長成，他的希望與恐懼，他的情愛與信仰，不過是原子（Atom）偶爾聚合之結果而已。無論何種熱烈的心火，無論何種英雄主義，無論思想與情感如何深密，不能保持個人生活於其死後，千百年之工作，各人之虔敬，各人之烟土披里純（Inspiration），各人之天才，在太陽系統全體死亡之日，終於滅亡而後已。總之，人類種種成績之大廟，其最後結果，總是埋於宇宙灰燼之下。以上各點，是無可質疑的，是已經確定的，反對這幾點的哲學，是不能希望成立的。」

假定所謂科學的哲學家告訴我們的，是人生毫無意義，如羅素所言，那不但社會組織的根據，完全喪失，而且人類生在世界上幹什麼？人類生在世界上，到底有無意義，我也不敢有確定的話答覆大家，但是我們活在世界上一天，總得從「人生是有意義的」這句話內出發

，然後學術，道德，政治才有寄託之處，羅素他們太重視求真，而拿善忽略了，所以有這種悲觀的議論。或者現代自然科學發見各恆星內而熱力散失，因而說熱力散盡的時候，就是世界死亡之日，羅素聽見這種科學的言論，所以他心上不免發生這種悲觀，這就是求真的結果，拿人生的重心放到自然界里面去，所以有這種人類成績終歸於毀滅之說。假定我們反過來，拿真與善並重，拿知識與道德並重，那麼我們有生命一天，就應該努力一天，應該向前求進步一天，自然不致流於頹廢，流於悲觀，這也是今後思想界的一個大關鍵，千萬請大家不要忽略，換句話說，以後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政治是建築在真善並重的基礎上，惟其覺得人生有意義，然後才有振興文化，才有復興民族之必要。

現銀外溢果由於銀價回高乎？

諸青來

近自美國議員提出恢復銀價之案，邦人驟覺不安，紛紛發表反對意見；以爲近年銀價業已回高，現銀溢出實由於此。若再提高銀價，現銀源源外流，金融恐慌更有助長之勢，爲禍不可勝言。愚對此說，頗不謂然。

(一) 近時銀價果已回高乎？

一九三二年紐約銀價，曾落至每盎司二角四分又四分之一，是爲空前之低價。近時銀價已否回高，試舉一例以明真相。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金銀市價（美國金銀均以盎司爲單位）

美國官定金價 三十五元 紐約銀價 四角四分半

上海赤金價 一百一十二元五角

美國官定金價三十五元，恰與新定金元成色相等，新者較舊實減少百分之四〇，九五。故五月十九日之銀價，雖爲四角五分半，倘以舊金元折算，實僅二角七分餘；較最低價僅回高三分耳。上海赤金價，係以市平十兩計算，市平每兩，較舊漕平約少百分之十五，故按漕

平折算，赤金每兩，仍須一百三十三元餘也。金價何嘗下落，即銀價並未漲高，時人謂近時銀價業已上升，顯與事實不合。

(二一) 現銀外溢之原因若何？

中國對外匯兌單位有二：一曰主位；一曰客位。主位匯兌者，以國幣為單位，表示與外幣相易之比率。如今日對英匯價，國幣一元可兌英金一先令三辨士八七五；又如國幣一百元，可兌美金三十八元等是也。俗稱先令長，即國幣一元可兌較多之先令，實即國幣價貴。若曰先令縮，實即國幣價跌，同為國幣一元，僅能易較少之先令也。所謂客位匯兌者，以外幣為單位，表示與國幣相易之比率；如日幣一百圓，合國幣八十九元是。日幣之漲落，俗稱為大小，如曰東匯小，即係日幣賤而國幣貴；稱曰大，則反是。東匯大小與先令長縮之表示相反，蓋一為客位，一為主位故也。先令長，東匯必小，縮則東匯必大；東匯大，先令長，則中國外匯有利，反之吃虧。按匯兌變動之原因，亦基於供求定律；外匯之供求何由而來，則由於國際收支，如貨物出口；政府或民間募外債；外人投資；華僑匯款等項，皆屬於國際之收入。償還外債；貨物進口；洋僑匯款；出洋游歷留學費等，皆為國際之支出。前者為外匯之供給者；後者為外匯之需要者；供過於求，則以主位表示之匯價長；以客位表示之匯價小

，求過於供則反是。外國貨物入超，每年約值數萬萬元，償付貨價，似須有數萬萬生銀出口；然事實上生銀反進口超過出口，即使出口亦不甚多，其故何哉？蓋因中國國際收支，除貿易一項外，大抵收多於支：華僑匯款；外人投資及借款，其數不小。外資流入我國，似有侵蝕利源之嫌；實則不然，此舉可增加國際收入，使匯市常有利於我；又能開發地利減少本國人民失業之痛苦。總之國際收入愈多，則匯價愈有利；反之支出愈巨，則匯價愈不利。蓋匯市之漲落，與國際收支有密切之關係者也。

中國對外匯兌，與其他金本位國不同，蓋除匯票之供求關係外，尚須受銀市之影響；銀市漲則中國外匯有利，落則吃虧。銀市之漲落；直接足以影響中外匯兌，間接足以影響國際貿易；如銀價跌，則持有銀幣者之購買力小，銀價漲則購買力大，我國建設事業，需用外國材料甚多，銀價苟能回高，似於我國利多害少也。在本位相同之國，本有造幣平價：(Mint Par) 如前英金一鎊等於美金四十八元六角六分是。中外匯兌，則無固定比率可言，因他國用金，中國獨用銀故也。對外匯兌，雖無固定之比率，亦有一時之平價，此時平價，係隨銀價而變動，銀價高則外匯長，(此指主位匯兌言) 銀價低則外匯縮，外匯應長縮若干，可由銀價高低推算而得。其計算方式爲〇、七八〇六六乘紐約銀價，設紐約銀價爲五角，則〇、七八〇六六乘五角，得三角九分餘。即國幣一元應合美幣三角九分餘。上海洋商銀行乃參照

此數，定為美滙掛牌；掛牌不過為一種標準，大抵每日一次。（亦有改掛二三次者，但不多見耳。）實際成交價格，俗稱內盤，則忽上忽下，變動甚繁，蓋隨其時賣買情形為轉移者也。設實際匯價，與一時平價相差過多；洋商銀行利用其差，一面買賣外匯，一面向海外銀市售銀或購銀，做套頭以牟利；倘在紐約售出或購進之遠期銀條，不予抵銷，（原售出者再買進，或原買進者再賣出，方可抵銷。）須裝現出口，或運銀回華。由是言之，現銀之須運出或運入，由於國內銀價較低或較高於海外；（即主位滙兌之匯價在平價之下或在其上。）國內銀價何以較低或較高，則因外匯之供多求少，或供少求多；外滙何以供求不相應，則由國際收支失其平衡所致。故現進出口，不繫乎銀價之高低，試觀左列一表，使可了然。

歷年倫敦銀價與現銀輸出入比較表

年次	銀價	現銀進出
一九二〇	最高八九·五〇〇〇 最低三三·八七二五	淨進九二，六三八，九七八 <small>關平兩</small>
一九二一	四二·五〇〇〇 三〇·五六二五	三二，四三〇，七一三

一九二二

三七・三七五〇

三〇・三七五〇

一九二三

三三・九三七五

三〇・五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三六・〇六二五

三一・五〇〇〇

一九二五

三三・四三七五

三一・〇六二五

一九二六

三一・八一二五

二四・〇六二五

一九二七

二八・〇〇〇〇

二四・七五〇〇

一九二八

二八・八七五〇

二六・〇六二五

三九，五七二，〇一二

六七，一九六，二二七

二六，〇〇二，五三八

六一，五二三，六二六

五三，二〇三，六七九

六五，〇八四，〇〇〇

一〇六，二九五，〇〇〇

現銀外溢果由於銀價同高乎？

一九二九	二六·四三七五	一〇五，八二六，〇〇〇
	二一·三一二五	
	二一·六二五〇	
一九三〇	一四·四三七五	六七，〇〇六，〇〇〇
	二一·五六二五	
一九三一	一二·〇〇〇〇	四五，四四五，〇一六
	二〇·四三七五	
一九三二	一六·三七五〇	三八，八九三，一一五
	二〇·五〇〇〇	
一九三三	一六·五〇〇〇	淨出 一四，一五四，二五九

觀上表所列，在銀價最高最低之年，均有巨量生銀淨進口；去年獨爲例外，淨出口一千餘萬兩，適在銀價較低期內。可見現銀溢出或溢入，隨國際收支情形而定；與銀價高低無甚關涉矣。

經濟生活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

吳惟平

人類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有經濟的生活，有娛樂的生活，有兩性的生活，等等。

經濟生活就是一切關於衣，食，住以及其他與此類似的物質生活。

這種經濟生活，牠在人類歷史中究竟佔了何等樣的地位呢？這問題，差不多就是現在許多人尚在爭辯着的一個問題，即：究竟是人類的思想支配了社會的經濟生活？還是社會的經濟生活支配了人類的思想？（此處不用「意識」而用「思想」，乃是因為意識一辭範圍太廣闊了。）

這裡先得研究思想的發生。依我看來，思想就是人類由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相接觸後而產生的一種心理作用。這種作用，與兩性間受孕的作用有相類似之點。所以思想既不是感覺機關所能够自由創造或獨立創造，也不完全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但每次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接觸的時候，所有印象固然是筆筆記錄在感覺機關之上。但昨日與某種外物接觸，今日雖遇到同樣外物，而印象所喚起的認識却不一定是完全相同。又因為牠在記錄時即附有「意義」遂成觀念。故往往不必與外界事物接觸，亦可以先有觀念，但這觀念不過是印象重現和延長或變化。比方，世界本無牛頭人身的怪物，我這時却幻想出這樣一個怪物，這也只是以前觀

念的重現和延長，因為假如先前的感覺機關沒有與牛頭和人身那兩種東西接觸，我就幻想不出這樣的怪物來。諸此類推。說到這裡，還只是說明了觀念與思想的發生。單就這「發生」的意義上講，感覺機關與外界事物是並重的，並沒有什麼主動和被动，換言之，尚無所謂支配。

支配問題是發生在有了觀念以後，而看觀念左右實際行動的力量是如何。換言之，這些已成的觀念究竟如何重現和延長？而支配我們的實際生活。這裡面就有主動和被动或支配的問題發生了。

這裡暫時莫問觀念是怎樣發生的，而這觀念的存在，絕無問題。試把人類的感覺假定在無論什麼時候截止，比方就截止在這一秒鐘吧，全世界每一個人的感覺機關內，總有多種觀念存在着，決沒有一個人是一張白紙的。這截止前既有的，我就稱牠為「已成觀念」，截止後再發生的，稱為「新起觀念」。全部時間每一秒鐘都可以作與此同樣的假定，故每一秒鐘內，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有已成觀念的存在，同時又都有新起觀念的發現。已成觀念因為各人所接觸着的外物不完全相同，牠是人人不同的，有的某種成分特多，有的某種成分特少，至少總有一些不同。這乃是人人不同的。所以人類思想與外界事物的關係，就是已成觀念與外界事物當中的支配關係，也就是已成觀念對於新起觀念的支配關係。這一段話，或許有人要

問我是根據那一本書的，如果這樣，那末我要提醒讀者：我不是在這裡介紹別人的學說。

那末，究竟二者之間是誰支配了誰呢？且慢！這裡先得申明兩件事：

第一，思想既是主觀機體與外界事物的交互作用，那末所有的心理，總跳不出對象的範圍。不過這句話是絲毫沒有意義的。何以呢？比方我問你：『貴府在那裡？』你如果說：『敵處地球。』這一回答，錯固沒有錯，但毫無意義，等於不回答。所以我所研究那個支配問題，是研究各人對於各自所接觸着的部份的對象。並非籠統的對象全體。

第二，我們又不能僅執其一，不究其二。現在常有人說：『必先有飯吃，而後才有思想，故吃飯支配了思想。』這種說法不會使人心服，因為同吃飯有同等重要的事物還多着，例如睡眠和兩性之類，如果可以說是吃飯支配了思想，何又不可說是睡眠支配了思想或兩性支配了思想？並且何又不可說是思想支配了吃飯？因為人類如果沒有思想，那末根本上連做一個動物的資格都沒有，那裡還有吃飯的問題呢？

這兩件事，前一件失之籠統，後一件失之偏枯，都不是科學的。明乎此，我們才可以研究心理與外物的支配關係。然而何謂支配？這又不能不先加以確定。凡是一個勢力較大的和一個勢力較小的相遇，發生一種交互作用，這作用，逃不出物理學中的牽引律，牠總是靠近于勢力較大的一方，而遠離于勢力較小的一方，那勢力較小的方面不能不遷就于或屈服于勢力

力較大的方面。這樣，勢力大的方面就是主動，小的方面就是被動，換言之，勢力較大的支配了勢力小的。所以一切的支配，都是被決定于相對兩方面勢力大小的比較上。

現在我們先來研究人們意識裏面的所謂「支配」。無論何人的先在觀念，都含有多種多樣的在內。其中有種種關於經濟方面的，有種種關於娛樂方面的，有種種關於兩性方面的，等等，非常之多。而且年齡愈大，閱歷愈豐，則其內容亦愈複雜。但這多種而且複雜的意念裏面，却不是雜亂無章，牠是有系統的。這系統簡直可以用一個國家作比喻。其中各種意念，有的勢力較強，有的勢力較弱，強的支配弱的，最强的便佔了王位，支配了一切。比方說，某人意念中同時存在着食慾，色慾和遊戲三種，如果是貪慾最强，色慾次之，遊戲又次之，那末色慾支配了遊戲，食慾又支配了色慾，換言之，色慾和遊戲都不能不壓抑下去，而遷就于或屈服于食慾，這樣，就是食慾佔了王位。不過這王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同是一個人，他有時是某種意念佔了王位，有時這王位又被另一意念所推動。比方我昨日整日思念着一個遠在南方的愛人，今日却又整日打着經濟的生活，那末昨日佔據我心中王位的是那個愛人，今日却變成爲經濟的生活。不過這又不是某時想着什麼便是受了什麼的支配，牠裡面是有一個動機的問題。比方我此時在這裏構思寫稿，單就這構思寫稿的意義上講，如果我的動機是爲宣傳主義，那末這是受了政治生活的支配，又如果動機是單純的爲了稿費，則又

變成經濟生活的支配了。諸如此類，這是意念與意念間的支配狀態。到這裡為止，好像還沒有說到意念與外物的關係，更好像還沒有說明觀念究竟是什麼。我們再往下說吧。

這個有如國家一般的先在意念，現在碰到外來的敵人了。這敵人就是外界事物或新進觀念。於是兩方開戰。開戰的結果，是有許多的不同。第一，有的先進觀念那方面，根本不發生變化。例如心不在焉的時候同外物接觸，常常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這種場合，就是觀念不變化。第二，又有的開戰的結果，僅使先在觀念有些數量上的增加或減少，而其支配狀態併不變化。比方我的觀念原就以爲母雞能够下蛋，今天果見母雞下蛋，那末這一外物，只是使我那種原有觀念多了一次的證明，並不是支配了我的觀念。因爲由這外物所引起的後進印象是很馴服的被我的先進觀念收編了。第三，又有的開戰的結果，先進觀念受了部份的支配。比方我原以爲人人都只有十個手指頭，但昨天竟然發現了也有十二個的，使我不能不因這一外物而放棄原有觀念的一部份，這樣，這外物的新印象，就是很明白的支配了我的先進觀念的一部份。第四，開戰的結果，更有的簡直是奪取了先進觀念的王位。比方我昨日是預定想做某種事情，充滿了關於某種事情的意念，可是突然看見一位美麗的姑娘，使我整天胡思亂想，所有一切觀念皆在無中消滅盡淨，這場合，就是新進的觀念奪了先進的觀念的王位，也就是新者奪了舊者的王位，支配了整個的意識。這種種戰爭的結果，

每一種都編入先進觀念的一部至全部。所以先進意念也並不是神秘的，牠就是每次意念與外物開戰的結果或每次後進觀念集積而成的。不過每次新進觀念之前，皆有先進觀念的存在，那怕望上追概到小孩，追概到呱呱墮地的一剎那間，也有先進觀念的存在，只是越望上追概，內容越單簡而已。這就是觀念和外物的支配關係。

所以觀念和外物的支配關係，並不是人人相同的。例如棋迷爲棋所支配，戲迷爲戲所支配，書獃子爲書所支配，癡病者爲情所支配等等。所以同是一種外物，牠一方面可以支配某人的觀念，但又未必能够支配某人的觀念。並且有時同是一個人，先前能够支配某種外物，而後來反爲該種外物所支配。例如吸食鴉片，當他還在逢場作戲的時候，那是觀念支配了鴉片；但若頻頻接觸，一到上了癮，弄成一舉一動皆不能不以一嗜好爲動機，則又變成鴉片支配了觀念。又有時同是一個人，先前本爲某種外物所支配，後來却又轉而能够支配同種的外物。例如初學騎馬，常常爲馬所支配，一到熟練之時，則又常常支配了馬。諸此類推。

于是我們研究到經濟的生活。經濟生活也是多種外物中的一種。牠也是一方面可以支配某人的觀念。但又專心能够支配某人的觀念。試分別言之。

先說不爲經濟生活支配者。不爲經濟生活支配，意思並不是說，某種人沒有衣食住等物質生活的需要。牠只是說，有些人的先進觀念的王位，常常不是經濟的生活，換言之，他們

的觀念中常常還有比較經濟生活更爲重要者。世界上確有一些人，他們除了飢時索食，寒時添衣之類機械的動作之外，觀念中常常甚而永遠沒有發現經濟生活的問題。例如有些富裕階級中的棋迷，他每天每天都是充滿了棋局的觀念，甚至連吃飯登廁的時候，也在那裡思想着如何做眼，如何做劫，根本沒有知道也不想知道經濟生活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樣的人，當然不能說他也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又如，有些經濟生活十分穩定的自然科學家，他的研究科學，一方面既無須顧慮到他個人的經濟生活，同時又無須拿社會的經濟生活作參攷，整天是在寫公式，照顯微鏡，也是從未涉想及經濟生活的問題，這樣的人，也不能說他是受經濟生活的支配。此外尚有多種多樣的人，例如殉情而死的，路見不平的，以及癡書戲迷等等，也都不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至少在他正做着這些動作的時候，不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不過這些人是否就是支配了經濟的生活，那是另一問題。依我說，他們是相對的支配了經濟生活，不過只是支配了他個人的，並不是社會的。或許有人說：這些人之所以能够如此，無非就是生活充裕的結果，無形中也是等于受了經濟生活支配。這種說法，弊病落在我上面曾經申明的籠統和偏枯，毫無意義。

那末何等樣人又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所謂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意思並不是說：多吃肉使肌肉豐潤，常飢餓則面呈菜色。也不是說：近水之處多居民，不毛之地少動物。這些

事情裏面自然也有支配的關係，不過讓牠放進生物學家的考慮中，當我們現在研究着重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社會關係的時候，無須過份重視牠，明言之，並不是說因此便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我們現在所要說的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是由三個步驟形成的：第一步，社會的經濟生活現出一個如何謀生的問題侵入人類的觀念中；第二步，這一謀生問題奪了觀念的王位，籠罩了大部乃至全部的觀念；第三步，所有其他一切的或大部的觀念，皆不能不降至臣屬的地位，遷就於或屈服於這一高據王位的觀念，換言之，個人觀念或先進觀念不能不投入社會經濟生活的洪流中，讓牠滾到那裏便到那裡，絲毫不能自主。這樣，就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

大抵受支配於經濟生活的，有四種形式：第一種是個人方面常常受到經濟生活的威脅，使他所有的思想，言語和舉動，皆不能不以解決個人的經濟生活為中心而出發，而且他的觀念不能不跟着社會的經濟生活的移動而移動，絲毫沒有自由。例如一般為勞動者，他們不但整天的為了解決經濟生活而做着被動的工作，而且因為有了失業和飢餓的恐怖，雖在休息時間內，也是充滿着經濟生活的觀念，不能不將其他一切觀念全部的犧牲或大部的犧牲。這樣的人，是很明白的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第二種是個人方面基本的經濟生活雖無問題，但又時時感到不滿足，全副精神皆集中在追求經濟生活的豐美上或擴大上。他們追求經濟生活的

豐美或擴大，觀念特別強烈，因而在社會中的競爭和傾軋亦格外顯明。例如一般的全業家，商人，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以及男的不惜聚衆爲盜，女的不惜出賣愛情等等皆屬之。這些人也是無可否認的受了經濟的支配。第三種是多不加入經濟的生產，沒有什麼關於生產的觀念，但又全部或大部觀念皆用在經濟生活的消費上。例如有些闊人的太太和小姐，充滿了奢華的經濟生活的觀念，整天都在思想着如何吃便好，如何穿更好，之類的物質生活。這樣的人，也是跳不出經濟生活的支配。第四種是不問他個人是否受了經濟生活的威脅，而他的感覺機關或先進觀念却頻頻於社會的經濟生活接觸，弄成全部觀念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生活的狀態，所有的思想至少大部份的思想都用在如何解決社會的經濟生活一問題之上。例如有許多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社會革命家，他們不但觀念中充滿了經濟的生活，而且往往不惜因此而冒險，甚至不惜因此而犧牲一切。這樣的人，也是很明白的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這是四種主要的形式。此外凡是先進觀念或個人觀念敵不過社會的經濟生活的威脅和引誘，一切動作皆以經濟生活爲動機者，都是受了經濟生活的支配。

說到這裡爲止，還只是說明了個人與經濟的關係，並未說到社會或人類。

須知社會或人類之與個人，有些不同。社會或人類好比曠野中的一片沙，個人只是其中的一粒。若以每一粒講，自然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黃色，有的是黑色，而且各色都是並立的

。但是，若以全片講，那末就有一個多數的問題。如果黃色佔了大多數，多至能夠掩過白與黑，那便應該說是黃沙一片。又如果白色佔了大多數，多至能夠掩過黑與黃，則又不能不說是白沙一片。人類觀念與經濟生活的支配關係亦然。那怕個人有的是這樣，有的是那樣，要是大多數人是怎樣，就不能不說社會或人類是怎樣。比方說，人人各有五官和四肢，這句話，只要多數人是如此，牠便可以成立，至於少數五官四肢不全的例外，是無損於牠的。所以說到社會和人類，就是說這多數的問題。

那末究竟是觀念受支配於經濟生活的人多數呢？還是經濟生活受支配於觀念的人多數？若以現在講，那是很明白，的確是觀念受支配於經濟生活的人居多數。如上所述，不受經濟生活支配的人，只怕還不到千分之一，其餘的便都是受到經濟生活的威脅和引誘，終生跳不出經濟生活的牢籠。所以現在社會的經濟生活的確是支配了人類的觀念。但是，若以過去講，那末問題又是很複雜。

依我的觀察，遠古的人類定是一大羣一大羣的過着羣團的生活。那種羣團，因為常常要同羣團外的異類或異羣競爭，羣團內的經濟生活必然是共同合作，至少是有組織的，並不是人人各自獨立的。並且那時候人口不多，謀生甚易，每人所耗費於經濟生活的時間，或許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換言之，經濟生活之在每人的觀念中，尙未佔到首要的地位。這樣，他們

的觀念是很準確的支配了經濟的生活。可是後來人口漸漸的增加了，經濟生活的內容也漸漸的複雜起來了，乃由羣團合作的經濟生活，一變而為各人獨立的經濟生活。這件事，恰恰等十一個大家庭的分家。當那合家的時候，兄弟輩的動作差不多是機械的，要工作時便去工作，可吃飯時便來吃飯，關於經濟生活，除了家長之外，全都不用操心。現在是各人獨立了，人人都成了家長，各人除了勞動和吃飯等機械的動作之外，還須要一個謀生的計劃。從此生活問題便開始侵入了人人的觀念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也由絕對的合作一變而為相對的互助。這就是觀念受支配於生活的一個預兆。再到後來，人口越發增加了，經濟生活不但越發複雜，而且成爲一件不容易解決的事情了，於是乎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又由互助再變爲對立，並且，那時候的經濟生活，一方面既是人各獨立，誰都管不着誰，同時又因爲分工的結果，誰都與誰有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社會便在這種對立和矛盾的背後，無形中長出一種勢力。這勢力適應於社會範圍的日益擴大，適應於矛盾和對立的日益深刻，而漸漸漲大起來。因此便有所謂社會的經濟生活，儼然與人類的觀念相對抗。這一對抗，造出一種空前的恐怖，就是：人人對於他們自己的經濟生活，縱然是克勤克儉，兢兢業業，亦不能保其必無飢餓的危險。至此，人人皆在無形中受了一種絕大的威脅，陷入手忙腳亂的狀態中。這一狀態又轉而爲增強社會的勢力。最後，社會勢力便高高聳出在人類的頭上，壓倒人類

，支配了人類的一切。人類觀念之受支配於社會的經濟生活，就是這樣造成的。

這一觀察，我相信不會十分錯誤。所以經濟生活之在過去人類的歷史中，的確佔了支配的地位，但也只是最近的過去，並非過去的全部。而且就是最近的過去，也有程度的不同。大概社會秩序愈紛亂，經濟生活愈恐慌，則受支配的程度亦愈甚。過去是如此，那末將來呢？

我們看了這過去的歷史，可以知道：人類觀念之所以反為社會的經濟生活所支配，完全起自經濟生活的恐慌，而這經濟生活的恐慌，又完全起自社會秩序的破壞。所以人類之有如此的歷史，與其說是生產力不夠，無寧說是組織力不夠。這組織力的不夠，也不是天然的，牠是社會範圍或人類團體擴大至突進階段時的一種變態。例如由羣團擴大而為部落，由部落擴大而為國家，又由國家擴大而為世界，都是突進的階段。在這突進的階段中，人類團體常常是突然的擴大了數倍，數十倍，甚至數百倍，因而始有組織力的不夠。現在的社會範圍或人類團體已然擴大至整個的世界，此後除非同別一星球接觸，否則不會再有那種突進的階段。所以人類的組織力畢竟不是永遠不夠的，終有能夠適應於環境需要之一日。那時候，人與人之間一切的對立，例如同行對立，階級對立，國家對立等等，必然完全消滅。這樣，關於經濟的生活，有幾種情形是可以預想得到的：第一，絕對沒有經濟生活的恐慌；第二，勞動

時間必然縮短。第三，各種各樣的精神生活必然擴大。故其結果，經濟生活之在人類的觀念中，地位漸次縮小，或許能夠縮小至不足輕重的程度，亦未可知。於是社會勢力乃爲人類所能够駕馭，人類觀念重新很準確的支配了社會的經濟生活。

我們從這種觀點上，可以看出馬克斯派的唯物史觀（其實就是唯經濟史觀），雖有部份的真理，但也還是十分的渺小，牠的壽命決不會很長。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于北平。

我們的經濟原則：

- ▲為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况計，確認私有財產。
- ▲為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
- ▲不論公有與私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統一計畫下，由國家與私人各分別擔任而貫徹之。
- ▲依國家計畫使私有財產漸趨於平衡與普通，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
- ▲國家為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和平方法移轉或吸收私人生產或其餘值，以為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
- ▲謀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上取得平等地位並得補助之，並促進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

中學生智識之基本

張君勳

(在中山大學高中部演講)

今日承劉主任之命，來與諸君見面，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與諸君討論之事，或從國家民族立論，或從國際立論；其題目很多，然諸位是中學生，在中學生的地位上，應如何讀書修養以爲他日上進之準備，或者此點更爲重要。所以我以「中學生智識之基本」爲題目來和諸君談談。

諸君知道，一個國家何以要有教育，不外乎求關於真、善、美三者，這些是先哲所已造成的，傳授於其子孫，更由子孫而傳授於未來之人而已。何謂真，善，美？科學是人類的知識，可以求真；修身及公民等科，可以求善；文學音樂等可以求美。人類文化，日益進步，以上三項之內容，亦因時代而有不同。我們古代但讀「四書五經」，歐洲讀「耶穌聖經」，注意個人之道德方面，並且要人謹守古人之規矩，此所以達「善」之目的。至於近代有所謂數學，物理，動植物等科學，不獨我國學術界視爲新科目，即就歐洲而言，亦視爲新材料。歐洲中學大學中加入科學教材，亦不過近百年來之事，且亦因此列入自然科學之教材。思想界曾經大起爭論，此所以達「真」之目的。另外文學等所以啓發人之情感，有時看了一次戲

劇，其感動力，遠勝於一篇道德的論文，因為心底幽微處的情感，比道德論所觸及的理性，有時還要強烈幾十倍。戲台上看一次悲劇，其印象之深，遠過於讀康德的「實行理性」，即此可以知道「美」的根苗，應如何培養了。以上真，善，美，三種成分，有時重「善」，有時重「真」，有時重「美」，各因時代而不同，前面已經說過了。

既為一民族，欲將古人之成績，深深印入後來青年之腦中，不能不以祖宗之作爲，教訓後來之人：第一，不可不知本國的歷史，地理。我族在此土上，立國已數千年，應知此土上之變化何如，前人已歷之經驗，如何可以有益於我們，今後應開展先人之事業者爲如何，這就是所以有歷史，地理兩科之用意。地球上除我們的一國外，尙有其他如美，俄，德，法，日，此等國家，我們亦不可不知道，所以同時復有世界歷史地理。總之地理，歷史兩科以告人類，告國民者，在你的祖宗如何，他國如何，你所居地上水陸如何，其最後之目的不外乎「善」。第二，人類不獨爲一國中之分子，同時亦爲大宇宙之分子，不可不知天文，地理，動植礦諸項，此諸項與我們人類之智識，眼界大有關係，且可以達「利用厚生」之目的，故近來各國學校，特別注重此數項。第三，更有一種科目，是爲語言，文字。語言，文字是人類表示意思之工具，人類因地理之阻隔，而成若干種民族，便有若干種語言，文字，有本國之語言，文字，同時又有外國之語言文字，有中國過去現在之語言文字，有外國過去現在之

語言文字。於是語言、文字之種類，多不可勝數。我們從前只有漢文，漢文之中，分爲散文韻文而已。現在文字之外，有語言，除了本國外，同時還有外國語言。爲商業計，非通英文不可，服務外交界，非通法文不可，專以醫學計，非通德文不可，因此學校的工作，較五十年前，加上好幾倍了。文字中之精者，是爲文學，從前只有本國的散文韻文，現在更有英國，法國，俄國文學等，所以陶冶性情者原來不厭其多，自然由實用的文字，推廣而爲審美的文字。然學語言文字之工作，是一種苦事，我曾見歐洲學生在文科中學六年或七八年，其十分之七八時間，用在臘丁，希臘的死文字上，歷史，地理科學，僅占小部分時間，以之與我們中學生英語相比，其難更不可以道里計。自以上三項言之。以前只有本國歷史地理，現在加了外國歷史，地理；以前只有本國文字，現在加了外國文字；以前無所謂科學，現在又加了自然及社會科學，諸君的眼界，固然擴大，然諸君的責任，亦因此加重，此皆由全世界智識之累積而來，不是我們自己能作主的。

以上將君所學之科目解釋半天，更就諸君自身與對於各科目之態度，稍說一說。兩千二百九十年前有一位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說了這一句話：

"As it is evident whether a boy should be first taught morals or reasoning whether his body or understanding should be first cultivated it is plain that boys

should be first put under the care of the different masters of the gymnastic arts: both to form their bodies and teach them their exercises".

譯成漢文，就是「孩童的德性與理解，二者孰應先教，孩童的理解與身體，孰應先發達，此問題本甚明白，故小孩應先令體育先生，教以訓練身體，使其身體有結構且勤操練。」

希臘人在歷史上最重體育，現世界上全國運動會名曰奧令配（Olympia），亦即古希臘之遺風。近年全國運動會中廣東人很出風頭，似乎不必以體育之重要告訴你們，但是這種話不妨重複一下，便是：無體育即無智德，身體猶車，智德猶物，車不堅實，則無從載物，想諸君或早已知道了。

中學中之科目，大家知道以「國」，「英」，「數」三項最重要。「國」指國文，「英」指英文，「數」指數學，但這三個以廣義言，可以代表三件事：一，「國」可以代表本國之歷史，文學，語言，文化等；二，「英」可以代表外國語及外國傳來之智識；三，「數」不僅代表數學，同時可為物理化學及自然科學之代表，茲以第三包括在第二裡面，但分兩項來說。

「國」字之廣義，可拿他來代表中國的歷史，思想及事物，諸君要知西洋各國之中學內

，無不注重本國之歷史，地理與文學。歷史科內，總是將本國人之事業，鋪張揚厲，說某年如何成功，某年如何失敗，即令失敗，亦必將其失敗之故，歸罪於人。至於本國文學，英國人必讀莎士比爾，司開脫，華次華司與近代的高爾斯華綏，蕭伯訥，德人必讀歌德，以及最近之作家，所以使其青年知其本國之有人，即所以使其青年尊重其本國之人物。我國向來讀經書，亦尊重先人之意，然此類書去現代生活太遠，正如義皇以上之書，使學生讀之，自然索然寡味。更有國中學者，太息於我國在國際上之失敗，歸咎於孔子，于是打倒孔家店及其他先哲，乃至凡古代之學說及制度，皆在打倒之列。要知道苟一國的國民，其心目中對於先人認為不足道，即其思想上失了中心。譬如德國人知道崇拜思想家如康德，菲希德，文學家如歌德，政治軍事家如卑士麥，毛奇；英國人知道崇拜思想家如陸克，休謨，穆勒約翰，文學家如蕭伯訥，威爾斯，政治家如格拉斯頓，狄司蘭里，乃至最近之張伯倫，阿斯葵，難道我國古人中就無可崇拜的人嗎？開拓疆土如張騫，班超，吸收外國思想如玄奘法顯，乃至近代安內之政治家如曾國藩，胡林翼，對外抗敵之義勇軍如劉永福，唐景崇，至於近二三十年來國內改革政治之領袖人物，尤為大家所共知，不必再來贅述。要知國民心中如無本國人可資崇拜，而一心傾倒于外國之列寧，墨梭里尼，是決不能立國的。一家之人，苟子孫以其家中祖宗之事業為光榮，自己自然亦會奮發，若是專門毀謗祖宗，則其子孫一定是不肖的子孫

了。

「英」字之廣大含義，爲外國語與外國傳來之智識。如前一段所言，好像是我勸諸君專讀國文，專崇拜本國，其實不然，我以爲今日除國學，國史以外，其第一當注重者，即爲外國語。近年國中有人專好說外國話，中國人同在一棹，開口便說外國話，前天有人告訴我，說有一位留學生在西關，遇見一個賣花人，他以英語問他，說 *What is the price?* 賣花人呆然不知何以爲答，即是好說外國話之最好笑的一例。中國人與中國人間說外國話，固然是不對，然因此便輕視外國語之研究，亦是不對的。中國從前與世界隔絕，現在與世界交通，第一，爲瞭解世界大勢起見，我國人不可不通曉外國文字；第二。我們科學智識是落在人後，在最近的將來要趕上人前去，或至少與之並駕齊驅，如何能不通外國文呢？中國既爲世界之一國，耳目聞見，應與他國一律。德國五人中，至少有一人通英文，法文，我們雖不敢望像德人一樣，然以後通外國語之人，總求愈多愈好，能看外國報，能讀外國書，自然不至對於外國人消息隔絕，便可以知道我國在世界上如何的危險，而「故步自封」的習慣也可以變更了。我是一個注重國文，國學的人，乃亦來勸諸君重視外國文，實以歐洲民族如英，德，法，相處既近，學話亦是容易。我國去歐美甚遠，惟有多讀歐美報紙，以耳目之接近，縮短地理上之距離，這是我國人民之要務，不可忽視的。

最後對於諸君，尙有一語，即諸君現在在中學時代，中學之「中」對於以前之「小」，對於以後之「大」而言，而諸君之時期，更有與小學大學異者，小學年歲幼稚，所知不過眼前事物，大學生已漸漸向於分科之期。至於中學生可謂之爲「能力潛伏」期，即其爲文學家，爲軍事家，爲科學家，爲法律家，尙在不可知之日，今日同爲同學，他日便分爲甲爲文學家，乙爲軍事家，丙爲科學家，丁爲法律家。謂能力潛伏即其能力尙隱藏於中，而未發洩，究竟將來自己致力於某方面尙未可定。那麼，在這時期內，對於各種能力，應以種種科學誘導之。換詞言之，在「真」，「善」，「美」三方面同時注意，以試驗自己將來應專心於三方面之那一方面，或注意於「善」而爲政治家，或社會改良；或注意於「真」而爲科學家；或注意於「美」而爲文學家，音樂家，尙在不可知之數，此時對於三者稍有偏頗，或者自己適宜之一面，便不發達了，所以暫時對於三者同時注意，以待將來爲適宜的決定。要知中國正在文化過渡時，諸君前途可作爲之事正多，望現在發展此「潛力」而將來選到一條自己適宜的路，是我對諸君衷心希望的一件大事。

再生雜誌 第二卷 再生雜誌 第二卷 再生雜誌 第二卷

第一期 目錄 第二期 目錄 第三期 目錄

今年的九一八

歐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與吾族立國大計

科學與哲學之携手

思想的自主權

民國成立二十二年尙在討論中之憲法

社會學家派克教授論中國

愛國主義

譚君勵先生講演詞書後

覆王吉占(恒)論廣西民衆來源書(通信)

近代西江流域學術思想之探源(附錄)

中外大事記

記者

張君勳

張君勳

張君勳

吳貫因

費孝通

楊祖培

王恒

張君勳

點 溼

記者 中外大事記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問題

民國成立二十二年尙在討論中之憲法

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

馬克思唯物史觀之分析及其批評施友忠

愛國主義

討論道鎰根本問題答葉廬先生

世界大戰中指揮同盟軍(書評)君勳

記者 中外大事記

張君勳

馮森

吳貫因

張君勳

楊祖培

張東溼

張東溼

愛國主義

民族觀點上中華歷史時代之劃分及其第三振作時期

「幹」與責任

倫敦經濟會議散後之各國

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

何謂國民所得?

選舉與代表制度

古希臘學者與今世科學文明

陶露論中國政治

愛國主義

記者 中外大事記

張君勳

元凱

諸青來

張君勳

公度

鄒文海

嚴軍

馮森

楊祖培

選舉與代表制度

鄒文海

第五章 選舉和代表制度缺點的補救

講到選舉和代表制度缺點的補救問題，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一般人常常談到的選舉票的改良，（註¹）選舉次數的減少，（註²）比例代表和職業代表的引用，（註³）以及創制覆決的推行等等問題。（註⁴）關於這許多，我都不想加以討論。它們既是大家已經注意到的問題了，那我們實在不必再隨聲附和說幾句話。況且選舉和代表制度的所以得不到結果，由於制度本身的缺點者少，由於不良環境造成者居多。因此，討論補救選舉和代表制度缺點的時候，恐怕更要注意於打破這種不良的環境。

老實說，我所以不討論選舉和代表政府制度方面改良的方法，並不因為這種問題是不重要的。制度的弱點，我不能不說它是使現代選舉和代表制度失敗的理由。這我在討論它們的理論與實際時，已經說過很多了。這種種制度方面的弱點，我們若是不能加以修正，選舉和代表制度，自然很難期望有好結果的。但是這制度方面的弱點，已經有人注意到了，而且早已有人在試驗種種改良的方法。我們不妨節省這方面的時間，用來討論如何限制惡勢力，這

個更有興趣的問題。

我相信無論那一種制度，理論和事實都不很一致的。理論，都是有一種理想的環境為背景，選舉和代表制度也是如此。當我們說：選舉和代表制度是使公意結晶的機器，是制裁政府的工具，我們並沒有看到錯綜複雜的社會，而祇以為人民是整個的，他們祇要有機會選舉，祇要有機會推派代表，他們的公共意志就可以表現了，政府就可以循着這個公共意志而行動了。但事實則不然。社會中有愚蠢的選民，有包辦政治的政黨，有造謠的報紙，有自私的經濟動機，有其他一切想不到的惡勢力，使選舉和代表制度的理想到處碰壁，而終於不免破碎和幻滅。我們若是不能改變現有的環境，使與理想中的背境稍稍調和，那選舉和代表制的命運，必定要歸到滅亡這條路上去的。

我們不要把制度看得萬能罷！天下最完美的制度，在不良環境中，也會變成不能活動的死東西的。選舉和代表政府制度方面的缺點，儘可以完全修正，但在現有的環境中，恐怕仍舊不能有好結果吧？簡單的選舉票採用了，比例代表制採用了，職業代表制採用了，甚至直接參政的方法也採用了，但在政黨，黨魁小組，報紙，以及種種惡勢力支配之下，選舉的形式主義和代表機關的腐化情形，到底有多少改變呢？我們還是努力於改良社會環境，選舉和代表制，或者就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了。

所謂改良環境，使得選舉和代表制度盡其所用，這並不是削足適履的意思，我們因為意識到選舉和代表制度對於近代民主國家的重要，所以願意用盡種種方法，以求這兩種制度達到理想的目標。我們的改良環境，以求適宜於選舉和代表制的運用，乃是製造合適尺寸的鞋子，而不是削足適履，這是應當辦明的。不然，一定有許多人以為我們這種「愚公移山」的方法是迂拙的。人類的活動，應當先認清一個方向；而認清方向以後，一定就要一息不息的向這個方向走去，雖是這條路上有許多荆棘，我們也要一面斬除這種荆棘，一面前進而不稍畏怯的。以下我們講一講改良環境必要的工作。

(一) 政黨惡勢力的限制

政黨，大家知道它支配選舉和代表機關的力量是很大的。任何有政黨的國家，政黨莫不為支配國家命運的惡神。它推舉的候選員，就可以是國家的政府當局，它決定的計劃，就可以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它差不多是政府上面的政府。不過它的地位雖高，却不向任何方面負責。它不是政府的機關，所以不受人民的監督，它不是法人，所以不受法律的約束。但是我們曾經好幾次說過，凡是握有大權而不受人民監督的團體，它必定要變為異常專制。政黨就因為這個理由而跋扈了，為人民之大患了。

有人說：政黨雖不向人民負責，但它們擁護的政府官吏，必須向人民負責。和人民發生直接關係的是政府官吏，不是政黨。所以政黨之對不對人民負責，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又有人說：政黨雖不向人民負責，可是它每每受公意的制裁，政黨而失掉大部分人民的同情，它是不能握有政權的。所以它對人民雖沒有法律上的責任，而事實上則必須受人民的監督。這兩項理由，都沒有顧到事實方面的情形，政府官吏雖然向人民負責，但官吏的向人民負責，並不就斷絕政黨予官吏的影響。政府受公意的制裁，但公意的造成，政黨也有一大部份勢力。從表面上看，政黨雖然不能十分放縱，而事實上它是不受約束的。

從一方面說，政黨是民主政體的罪人，但從另一方面說，它亦是近代民主政體中必要的機件之一。在諸大的近代國家中，若是沒有政黨做人民與政府的介紹人，恐怕根本不能有民主的政體。這種話，在前面已經說得很多了，不再聲述。但政黨既是民主政體中必要的機件，自然不能把它根本取消，不過將怎樣減少它惡的影響呢？我可以簡單的敘述一般人的主張如下。

1 陋弊法規的制裁。大家或者還沒有忘掉政黨怎樣去操縱選舉。它用金錢購買選票；用武力對待政敵；用宣傳欺騙民衆。這種種手段，大家雖是認爲不道德的，但政黨爲競選勝利以後的贖物，它願意受羣衆的笑罵，而不甘心放棄這塊肥肉。甲黨因賄賂恫嚇宣傳而勝利了

，乙黨自然也起來效仿，以後互相發明，以致天下最污濁最卑賤的行爲，都可以在競選運動中看見。

但是這種衆人所不齒的行爲，決不能永遠遺留於人世，政黨雖以此爲爭勝的工具，而忠厚的國民，自然不能老讓這樣的罪惡流行。由是一般人有制訂陋弊法規（*Corrupt Practices Legislation*）的運動。美國對於這種運動是很普遍的，現在差不多各邦都有幾條陋弊法規了。（註⁵）它們限制政黨於選舉中活動的範圍，可以說已日益精密。

現在陋弊法規所禁止的行爲，不外賄賂，恫嚇，以及不負責的宣傳等等。這自然因近來最流行這幾種毛病的緣故。將來若再有別的不正當行爲發現，陋弊法規中自然也會有新規定的。

賄賂恫嚇，以及不負責宣傳之應當禁止，那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常常說：選舉的意義，在於自由的選擇，若是選擇的自由可以剝奪，那選舉自然就是種形式了。我們不要因爲受賄的或是恫嚇的是選民中的少數，以爲這對選舉的結果，不至發生很大的影響。一個兩個人的受賄，一個兩個人的受恫嚇，即足以使大家對於選舉的觀念改變。選舉票假使可以用金錢購買，選舉權利假使可以受強權的威脅，那我們對於選舉的理想，已經完全消滅。經濟勢力和武力主義之下所選出的代表，能否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呢？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不

可能的。選舉既祇是產生少數人利益的代表工具，那選舉的權利又何所可貴？放棄選舉的權利又何所可惜？其結果必至人人以為選舉是可有可無的，它祇是政黨要留意的事情。

我們相信以上所說的並不是種神經過敏的推測之辭。選民放棄選權的事實，可以做我們有力的證據。我們固然不能說選民的放棄選權，都因為政黨剝奪了他們選擇的自由，但最少有一部分是因為這件事實。在近代社會組織之下，稍能觀察事實和分析事實的人，都知道他們選舉的權利，會因為別個選民的受賄或受恫嚇而受到傷害。某幾個選民的為人操縱，就等於增加了那操縱別人者的選舉權，亦就是減少了那不能操縱別人者的選舉權。所以在形式上儘管是一人一票，而事實上是有有的投數百或數千票，而有的祇投一票。這種投一票的人，自然要覺得自己力量的薄弱而不願意投票了。（註6）

還有許多人以為政治是污濁的，所以他們不願意參政，（註7）不願意投票。而這裡所說的污濁政治，恐怕也指政治中賄賂和恫嚇等等不道德的行為而言。假使選舉的時候，各人可以發表他自由的意志，而各人的意志受到相等的重視，那選舉實在是各人政權的行使，無所謂污濁，也不至於不願意投票罷？

到這裡，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們必須保障選民有表示自由意志的機會，必須努力消滅賄賂恫嚇以及不負責的宣傳等等不道德的行為，而後選民對於選舉的觀念，才會改正，

選民對於選舉的興趣，才會增加。

不過僅僅制訂陋弊法規，自然還是沒有用的。我們必使這個陋弊法規有真實的制裁力量，然後污濁的政治，才有淨化的希望。我們回顧歐美各國，英美是有陋弊法規的，德法是沒有陋弊法規的，但德國的政治，未見得比美國更爲污濁。亦許因爲美國的政治，本來就是最腐敗，但它的沒有使陋弊法規有切實制裁的力量，也不能說不是一個很大的原因。現在的陋弊法規，似乎祇是爲政黨造一個攻擊敵黨的機會，而人民是很少利用它的。換句話說，如果政黨中間有個默契，大家不要互相指摘違法的行爲，那陋弊法規就要有若無了。我們不但要提倡制訂陋弊法規，而且還要引起大家尊重這種法規的心理，而後它才會有嚴格的制裁力量。

2 競選費用的限制。僅僅制定陋弊法規來約束政黨不道德的行爲，當然還是不夠的。法律這個東西，有時祇是叫老實人吃虧的牢獄，並不能算是最公平的準則；而且它亦總是過分呆板，不能十分運用自如的。政黨所採取不道德的手段，事實上有許多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政黨因競選而特別開的遊藝會或聯歡會，自法律的意義說，不能算是一種賄賂，但其結果則與賄賂相等，一般選民因受它的招待而傾向於它了。若是這種遊藝會或聯歡會不受法律的限制，那財力雄厚的政黨，自然很容易擊敗它的政敵，因爲它可以用種種奢侈的娛樂去引誘

選民的。我們不要太看輕了遊藝會或聯歡會這一類性質的集會，有時國家的政治命運，就決定在它們手裡！選民既未必多有高深的知識，堅貞的節操，那他們的愚昧和貪鄙，往往就是受騙的機會。他們既可以因金錢而出賣他們的選權，自然也可以因一飯之恩而決定他們投票的態度。國家雖可以制訂法令，嚴禁賄賂的行爲，但它不能禁止目的在賄賂的娛樂。這樣，政黨依舊在假面具之下做它的不道德行爲了。

賄賂的方法，雖然日益巧妙，而防止的計劃，也日益精密。現在有人主張政黨的競選費用，根本應當限制。（註9）政治中許多不道德的行爲，都是金錢造成的，而競選時期的罪惡，更有許多憑藉了金錢的力量。沒有金錢、賄賂是不能行了，盛大的遊藝會或聯歡會是不能開了。政黨政治的罪惡，已從根本那兒斬去。

我們假如知道競選中政黨所用掉的金錢有怎樣一個驚人的數目，（註9）我們一定會贊成限制競選費用的提議。政黨所消耗的金錢，固然不能說全部用來作不道德舉動的，（註10）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構成罪惡的要素。政黨祇要有豐富的財庫，它就可以逃避法律的注意，而達到不道德的目的。用電影滑稽劇或汽水冰其凌去打動選民的心理，實在和用金錢去賄買選舉票，一樣是不可恕的。法律的防範雖極嚴密，而於政黨使用金錢的方法不加限制時，許多公認的罪惡，還是不能滅跡的，所以我們不如規定競選中政黨的費用，使它不再有施展狡滑的

餘地。

我們還可以想到其他所以要限制競選費用的理由。在現在的競選戰中，候選員第一個要具備的條件是富裕的經濟。德國的人民代表，差不多是五萬馬克的代價，（註11）而英國人民代表所消費的也在六百鎊至八百鎊左右。（註12）這一種事實，不止使政治污濁化，而實在亦剝奪了無產者被選的權利。民主政治所昭示於我們的是所謂機會的均等，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政治上的機會，都為財閥們搶去了。在英國，不能把八百鎊去做政治上冒險事業的人很多罷？在德國，不消說，五萬馬克也是貧寒階級難於湊集的數目。我們除非限制選舉中經濟的勢力，各個人政治上的機會，實在難期平等的。

自然祇要你有圓滑的手腕，祇要你願意和政黨携手，這區區的經濟難關，或者是很容易打破的。但這個時候的你就不是以往的你了。你放棄你的主張，而聽從政黨的指揮。你從此以後再不要夢想做人民的代表，而乾脆做發表政黨主張的放音器罷。所以說我們要逃避政黨鐵的手腕，競選費用也是應當限制的。

限制競選費用的方法，英國一八八三年的陋弊法規定得極詳細。它說：二千人以下的選舉區（Borough）最多可以用三百五十鎊，每增加一千人可多用三十鎊；二千人以下的選舉市（County）最多可以用六百五十鎊，每增加一千人可多用六十鎊。候選員中定得有個會

計，金錢的出入，都由會計管理。而會計的帳目，選舉後三十五日內在該區或該市的兩種報紙中公佈。（註¹³）這種法規制定以後，我們不能說所有的腐敗情形都消滅了，但至少可以說比以前好些。美國追踵的模仿英國的辦法，也曾經收獲很大的效果。

3 經濟來源的公開。公開經濟來源，可以說是幫助限制競選費用的一種方法。經濟來源一不公開，限制競選費用，或者不會很有效力的。所謂競選費用，很難確定其應有的數目。普通說，廣告費電報費郵費以及召開公共集會的費用，都是競選中正常的費用。但到底一個候選員要用多少錢才能開支這許多費用呢？我相信誰亦不能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但是政黨若不受外界的津貼，那它自己向黨員募捐來的黨費，決不足以弄私舞弊。我們祇要斷絕財閥予政黨的津貼，政黨的競選費用雖不限制，政黨所犯的罪過，也不會很多的。

我們若是一方面允許財閥和大公司的報效政黨，而一方面限制競選費用，這實在是不很合理的。我們的所以要限制競選費用，一方面固然要減少選舉中的罪惡，而一方面也要降低財閥支配政黨的力量。政黨為謀競選的勝利，它不得不仰賴財閥，以期得到大宗財貨，以為收買選民的資本。所以政黨一方面操縱選民，一方面却為財閥所操縱。我們限制競選費用，一方面要解放選民，使他們脫離政黨的束縛，而一面也使政黨不需巨額的金錢如此，它也可脫離財閥操縱。但是財閥報效政黨的事實一日不絕，這第二項目的是不容易達到的。財閥和大

公司的經濟利益，既與政黨所定策略有密切關係，我們就不容易防止它對政黨的賄賂。

要政黨公開經濟來源，就是斷絕不正當經濟來源的一種方法。大公司和財閥報効政黨的實在情形，一旦公佈於社會，國民會不驚駭而責問麼？我們不怕政黨受財閥和大公司的報効，而怕這種行動，於秘密中進行。財閥和大公司固有補助政黨的正当理由，那這種事就不必秘密進行，因為公開以後也不會受人譏評的。但若是財閥和大公司的報効另外自私的目的，那這種罪惡應當立刻停止，因為我們不希望財閥和大公司的經濟勢力，假政黨的命義來污濁政治。

英國對於政黨的經濟來源，似乎是不很注意的。他們大家都公認經濟是競選中必要的工具。（註14）潘洛克說：英國人祇注意於競選費的用法，而不注意於競選費的多寡。（註15）自然，選舉中賄賂威脅這種卑鄙的行爲，這是我們最要設法消滅的對象，但放任私人對政黨的損輸，這就是承認用經濟勢力去污穢政治的事實。私人假使不對政黨的政策特別有興趣，爲什麼他們要幫助政黨？假使說他們的幫助政黨，因爲政黨政策和他們的利益一致，這等於說他們可以用金錢去幫助爲他私利奮鬥的機關，這就等於說，民主國家依舊可以用金錢的力量去建築特殊利益的藩籬。這實在是不公平的。而且我們既已認爲政黨選舉用費應當限制，而又以爲私人可以盡量的捐助政黨，那在理論方面，也是不很一貫的。

歐美各國政黨的經濟來源，有許多是出於資本家的捐輸，有許多是出之於黨員的納費，單就英國來說，那守舊黨的經費大多是資產階級的賜予，而勞工黨的經濟，可以說是分派在各個黨員身上的。因此之故，守舊黨常常為幾個有錢的人把持，而勞工黨比較有民主的精神。從這點說，我們就可以看出割斷私人對政黨作捐輸的好處，而要斷絕私人對政黨作捐輸，公開政黨的經濟來源，自然可以說是最好的方法。現在的政黨，很少願意把它的經濟狀況公佈的。這就是因為它們的經濟來源，有許多是不正當的。它公佈以後，一定要受到人民的攻擊了。

4 政黨經費由黨員負擔。潘洛克教授極力主張政費由黨員負擔，實在有獨到的見解。我們要斬除資本家對政黨的勢力，我們要提高政黨民主的精神，這個條件，其實是不得不採納的。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不會輕視經濟在政治中所佔的地位。政黨而沒有可靠的經濟來源，工作人員是不能雇用了，印刷品是不能出版了。換句話說，政黨必定得停止它的活動。我們如以為政黨是近代民主國家中必要的機具，那末就得在這種機具上時時加油，不讓它停止動作才是。然而這種油從什麼地方來呢？財閥的捐輸，我們是不贊成的，我們祇有請黨員擔負他們政黨的費用。

黨員要政黨的策略民主化，這一點點犧牲實在是必要的。愛護政黨的人，一定願意政黨

從財閥的鐵爪下解放出來；而對政黨有興趣的人，也一定願意政黨的行為，不受財閥的約束。這個，他們必須對政黨有一點貢獻而使政黨處於經濟獨立的地位。現在的政黨，因為它企求資本家的援助，所以它所定的政策，都受到資本家的牽制。而黨員自己擔負政黨的費用，這個難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而且決定政策的權力，我們要它從幾個人分散到全體黨員，黨員自然也應當付與相當的代價。現在政黨的所以要為幾個領袖壟持，就因為政黨的活動，都是幾個領袖造成的。沒有領袖，政黨的經費就沒有着落了，政黨的生命，恐怕也就要停止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員要求顧問政黨所定的策略，實在是不可能的。不負責任的權利，這非但不合正義，而事實上也是沒有的。黨員要政黨的行為民主化，——那就是說黨綱的決定，必須得黨員的同意，候選人的推舉，必須得黨員的擁護，——那他們就得共同維持政黨的生命。你一日逃避你對政黨所負的責任，你就一日沒有與開政黨行動的權力。

或有人說：要政黨的巨額經費，由黨員負擔，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們普通相信黨員的加入政黨，因為他們對於某一種政策的信仰。這要是事實，那他們對於政黨些微的擔負，自然也不會逃避的。這正如愛國的國民，不會怨恨合理的賦稅一樣。假使黨員愛黨的熱心，已在願意擔負政費之下，那或是這個政黨沒有存在的價值，或是這種黨員已失掉黨員的資格。這

兩種現象，都不能說是通常的情形。我相信在通常狀況之下，黨員擔負黨費的計劃，總是可以實行的。現在各國政黨的經費，祇有社會黨由黨員負擔。但社會黨的黨員，他們的經濟情形，並不比守舊黨的來得充裕。反之，他們比較的都是無產階級。但他們對於政黨的信仰，克服了經濟上的困難。這可見黨員之願意或不願意擔負黨費，在於信仰之堅不堅，而不是不能的問題。

5 提名 (Nomination) 方法的改良。現在選舉制度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提名的權利，完全為政黨操縱。以前美國的候選員由政黨的預備會 (Caucus) 或黨員代表大會 (Delegates Convention) 推舉，可以說政黨就是決定候選員的機關。(現在美國已有許多邦採用直接提名制度) 至於英國，雖然祇要得到十個選民的簽名和願意出一百五十鎊抵押的人，就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在選舉票去。但是伯明罕 (Birmingham) 政黨決定候選員的例子一開，和美國也差不多了。(註16) 提名這個手續，在選舉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現代政治組織之下，沒有經過提名的人，可以說就沒有當選機會。國家的法律，雖然沒有禁止選舉未經提名的人，但選民怎能於茫茫人海中，自己去找他所願意舉的人呢？因為這樣，提名在選舉制度中實佔重要的地位。

現在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直接選舉的制度而提名，就可以說是一種變態的初選。

剛有選舉制度的國家，初選的權利是賦與多數選民的，而複選乃是一般特殊階級的權利。近代則不然，初選的權利由一般特殊階級享受，而複選則由人民舉行。兩種制度的結果是一樣，國民的選舉權利，都受到嚴重的傷害。在複選制度之下，人民不能最後決定他們的代表，而在政黨提名的制度之下，人民又祇能某一個範圍之內，運用他們選擇的自由。

但是提名這一個手續，亦許是必須要的。中國以往沒有提名這個手續，而結果是選舉票散、分得到極少數選票的就可以當選。從理論方面說，這自然不是好現象。代表既已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如何得到很少數的選票就可以當選？在事實方面說，這也是有點缺點的。從好幾十萬選民中取得幾千票，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這樣，大家都要參與競選，而結果則候選員的質地，勢必大大降低。況且選舉票既不集中，當選者和落選者所得的票數，相差一定近極，那為什麼多得幾票就可當選，而少得幾票就要落選？這也是很不公平的。

看了上面的話，我們不能反對提名這種方式，但一定要反對為政黨所操縱的提名。提名的意義，在於使選民多一個討論的機會，使他們充分認識競選者的能力，而把選舉票集中於幾個德高望重的好人。若是提名祇在暗中進行，那人民自然沒有參與的機會，提名的意義就完全失掉了。政黨預備會或代表大會推定的候選員，那祇是剝奪人民選擇的自由，和提名的精神完全不相一致。

因爲以前所說的種種理由，所以有人主張直接提名（Direct Primary）。那就是說：在正式選舉以前，再來一次預備選舉。這種制度和其他種制度的命運一樣，有它的朋友，也有它的仇敵。贊成它的，如休士 Hughes，波拉 Borah，史密士 Smith，賓休 Pinchot，以爲這種制度可以減少黨魁和小組織被推爲候選員的機會。而反對它的，如塔夫脫 Taft（註17）道威士 Dawes 等（註18）又以爲此種制度增加了黨魁和小組織活動的機會。這種理論，墨菱以爲都不合於事實。（註19）直接提名和政黨提名一樣，既會產生好的候選員，也會產生壞的候選員；它需要環境的改良然後才能保證有好的結果。墨菱豐富的經驗是很可佩服的，而他客觀的結論，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但是我相信他是擁護直接提名的一個人，他批評反對直接提名的理論說：要是直接提名的方法不能產生好的候選員，那政黨所推舉的好的候選員，也一定不會於選舉中當選。（註20）這就是說：要是有人因爲他的賢能而不能於直接提名中推選爲候選員，那他也不能在選舉中當選。投票的選民不就是直接提名中的選民，他們的態度怎能兩樣呢？墨菱這種意思，實在是很透關的。我們除非根本反對選民有投票的資格，怎能單獨懷疑他們直接提名的能力呢？

我們如果要打破選舉的形式主義，我們如果要引起選民對選舉的興趣，直接提名恐怕是必須要的。預選會或代表大會爲我們推定的候選員，無論怎樣的賢能，但選民選擇的權力，

已經受到了無限的傷害。選民在政黨規定的範圍之內享受他們的自由，這多沒有意思！無怪選舉要變成一種形式，而選民對它要不感興趣了。直接提名採用以後，我們固然不能保證所有的候選員都是賢能之士，但最少選民可以滿足了。他們覺得已經享受了完全的自由，而以後政府人員的不能稱職，應當由他們自己負責。所以直接提名的方法，不但可以使選民對選舉發生興趣，而同時還增加了他們對政治負責的觀念。

我最後所舉的理由，若不僅僅是推測，那直接提名實在可以減少政黨不良的影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制度之下，政黨減少活動地步。但選民對政治負責的觀念，使他們對於政黨所提出的人物和政見，都要加以精細的考慮。如此，黨魁和小組織的勢力，或者可稍降低了。我以上所擬的幾個方案都在設法使選舉和代表制逃避政黨勢力的干涉，而同時也在設法使政黨離開經濟勢力的侵蝕。我並不以為政黨是應當消滅的。反之，我還以為它是民主政治中必要的工具。這種意思，我在前面說過很多了。它使人民對政治的意見，集中在幾個問題之上。它這種領導的功用，我們實在是不能否認的。但是它希望用鐵的手腕，來壓迫人民自由的意志，這是我們應當反抗的。它一日離開了領導者的地位，而希望專制地獨裁一切，我們是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從事政黨事業的人會覺悟過來，接受我所說的幾個方案，那對它自己的命運，恐怕也是有利益的。

(二) 報紙惡勢力的限制

新聞事業很早就爲人注意，而重視新聞事業的人，對如何舉辦新聞事業往往有極高的理想。卡培德 Cabat 曾說：（註 1）一縣一省一國祇能有一種報紙。而報館的主筆，要人民公舉。主筆的資格，不在他能否寫動人的文字，而在他能否絲毫不假地把事實公之於大衆。卡培德雖是十八世紀的人，但他對近代新聞事業的弊病，似乎已經認識清楚。他所想的方法，都是針對這種弊病的良藥。主筆和報紙的態度，有極大的關係。祇要主筆是大公無私的，不畏強暴的，那他所辦的報紙，決不至趨奉一兩個人，或聽一兩個人的指揮。我們祇要得到好的主筆，就不怕報紙變成惡勢力了。在卡培德心目中，民衆雖不怎樣聰明，但決不至選一個不爲自己利益着想的人代他們發表演論。而且主筆由人民選舉，就要受人民的裁制，他一旦離開民衆的立場，而發表反乎民衆意志的言論，人民就可以立刻斥退他的。

說一縣一省祇能有一種報紙，實在很有獨到的見解。報紙一少，報紙間的競爭少了。它們不怕銷路有衰落的危險，自然就不必迎合閱衆的心理，報告人家喜歡聽的消息。這樣，辦報的固然少了一層顧忌，而閱衆也可少受一批欺騙。

不過卡培德到底是十八世紀的人。他祇知道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祇要任其自然，不加束

縛，那天下的真理，他們都能發現；天下的好事，他們都會去做。（註22）他相信人民能小心地利用他們的權利，舉一個真能代表他們的人當主筆。但他沒有想到人是往往爲物質環境所牽制的。他們因沒有充分的智識充分的閒暇，常常把他們的權利，送給幾個不相干政客。我們一方面固然讚嘆從前思想家的遠見，而一方面也要覺悟到他理論狹隘的地方，自己找求一更適合於近代環境的調度。

我們說報紙是惡勢力，就得問它怎樣會變成惡勢力的。我們對於報紙，並不是沒有高尚的理想；我們常常說它是鼓動輿論和領導公意的一種工具，但爲什麼這種理想要失敗，而報紙反變成一種惡勢力呢？

報紙的所以變成腐化勢力，不完全因爲沒有賢能的主筆，我們就是能得到賢能的主筆未必即可以消滅報紙壞的影響。報紙的罪過，不能由主筆一人負責。其他經濟的壓迫，政府暴力的壓迫，我們也要加以相當的考慮。我們要知道不但主筆的懦弱無能，使它不能登載公正的消息。而財閥和有權力者的從中操縱，實在是報紙有所偏私的原因。報紙的所以有惡影響，既不僅僅因無才無德的主筆，那我們要去消除報紙的惡影響，當然也不能僅僅在得到有才有德的主筆。

我覺得要報紙爲民衆的喉舌，非先有獨立的經濟獨立不可，而要報紙的經濟獨立，非報

紙收爲國辦不可。這兩個條件應當相提並論的。非國家，決沒有人有這樣的財力，可以支持這樣消耗的事業；非報紙的財源有恃無恐，我們也決不能保險報紙不向外界要求津貼。報紙完全是犧牲的事業，它的性質，和教育事業相仿。辦報的人，應當尊重他人的利益，他們一爲自己的利益着想，人家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報紙不能用以爲謀利的，報紙一變爲營利的事業，它的價值，就會降低。辦報的拿出許多資本，並不能希望有經濟的收獲，而祇希望充實一般人政治的智識，養成一般人正確的眼光。這一種犧牲自己而爲公衆謀利益的事，我們不能希望出之於一二人的善舉。我們應各個人擔負一份責任。而各個人擔負一份責任的方法，就是報紙國辦。

現在報紙的所以不能大公無私，因爲它根本是一兩個企業的私人機關。這種辦報的人，雖一時受到經濟損失，但因爲要達到某種目的，這點損失是無所顧惜的。他們的收獲，不在很淺近的經濟酬報，而在淆亂一般人的聽聞，使某種不正當的企圖，得以實現。我們一定要從私人手中奪回經營新聞事業的權利，信託給國家舉辦，然後我們才可以根本鏟除新聞事業腐化的勢力。國家的事業，國民有權利享受，也有義務監督，它等於我們所開公司中的事務，我們多少可以顧問。所以報紙國辦以後，它就不致是不負責任的東西了，它一經登載違反事實的新聞，國民立刻可以起來責問和矯正了。

亦許有人說：新聞事業的國辦，不一定就可以去除偏私的陋習，因為國辦的事業，儘有許多祇爲一部人謀利益的。所謂新聞事業國辦，並不是抽象的國家去辦理新聞事業，而是國家的政府——更切實的說是政府的官吏——去辦理新聞事業。這許多政府任命的官吏，不也會奉承一階級的意志，而爲他們假造新聞？新聞事業商辦的時候，政府還利用自己的勢力去控制新聞界輿論。一旦新聞事業國辦，政府不更可以隨心所欲，假造新聞或禁止真實消息麼？政黨政治，我們承認是將來依舊存在的現象，那所謂國辦的新聞事業，不會變成在朝黨一黨一派的宣傳機關？

這許多責難，很值得考慮。但我要問現在商辦的新聞事業，到底享受多少自由？國家檢查新聞的權力，輕易不使報紙公佈真實的消息；而資本家經濟的壓力也使報紙沒有隨便喘息的餘地。現在打算改進新聞事業的計劃多了。而美國一九一二年聯邦法令，迫令報紙公布它的主筆經理以及發行者的姓名，而於其經濟情形，尤須詳爲說明。它以爲這樣可以使閱衆知道報紙的背景和目的，而報紙亦不能隨便受人津貼了。但這種精密的法令，並沒有產生多少效果。（註23）報紙依舊是私人的工具，政黨的爪牙。報紙國辦以後，就說有一般人推測的那樣腐敗，但亦許不至比商辦時期更爲腐敗罷？

國辦的報紙，應當向全體人民負責。換句話說，應當受全體人民的監督。所謂向全體人

民負責，在人民智識沒有充分發達的國家，雖等於一句空話，但在人民智識相當發達以後，自然有一點意思的。所謂受人民的監督，在人民不能監督的時候，固無從實現，但在能監督以後，就可處處防範，不使它有不忠實的態度，或發表不利於人民的言論。在從前，報紙祇向私人負責，供私人的使喚，而以後要向全體人民負責，供全體人民的使喚了。以前的報紙祇以私人的意志為意志，而以後要以公眾的目的為目的了。以前的報紙可以用甜言蜜語欺騙閱者，而以後要盡力宣佈真實消息，供給真實新聞了。以前的報紙祇是造謠的機關，而以後是教育人民的學校了。這並不是國家有出人意表的魔力，而是我們各個人的努力，使報紙不得不變為我們理想中的東西。

自然，將來國民之能否監督新聞機關，是很生問題的。以現在選民不能選舉賢能官吏的事實來說，將來的國民，十之八九是不能監督新聞機關的。新聞事業不能說不是專門的東西。標題的排列，廣告的地位，以及其他一切專門的問題，都不是人民所能了解的。人民的思想，永遠是平凡。人民的眼光，永遠是淺短。他們祇能被人領導，怎能領導人家？他們是盲羣。因為沒有眼睛，才找報紙做他們的向導，怎會反去監督報紙？

然而人民雖不能指示一條路給新聞界走，但他們可防範報紙受惡勢力的影響。他們以忠實的眼光，監察新聞界是否受某一方面的賄賂。他們以赤誠之心，援助新聞界不為暴力所摧

殘。現在新聞界的造謠，無非因造謠有利可圖，或因受某種勢力的壓迫，不得不造謠。人民能留意這兩點，他們已盡他們監督的責任了。又何必一定要發號施令，命令新聞界這樣那樣，才算盡監督的責任呢？

要說報紙國辦以後，一定得比現在更爲腐敗，那我們以前怎會把學校叫國家去辦理呢？報紙若真是各人所說的教育的工具，那學校可以國辦，報紙就不能說不要國辦。它們同是使人們心靈發育的一種工具，爲什麼一個要國辦，而一個不要國辦呢？國家假使會利用報紙來愚蔽人民，那它早已利用學校教育來禁錮人民的智慧了。提倡國辦教育而反對國辦報紙，這誰亦能看出他的矛盾。我的所以提倡報紙國辦，正如以前人提倡學校公立一樣，因爲這是公共的事業，由私人辦理是有許多不便的。國家最初主管教育機關的時候，我相信一定亦受到好多的非難。他們覺得國家而可以干涉各個人的內心生活，這實在給國家一種太危險的武器。它或者要利用這種武器來鎖住我們的心靈。但教育終於國辦了，在教育國辦的國家，人民心靈的發育，更來的迅速，由是以前許多惡意的推測，到此都失掉它的根據。這一種實際的經驗，我希望它能給我們報紙國辦這個主張理論上的基礎。

到這裏，我有一點應當聲明，那就是此地所說的報紙，並不指一切新聞紙而言。我希望國家有一種報告政治消息和討論政治問題的報紙，關於其他方面的新聞事業，則依舊商辦，

亦無不可。報紙的所以要國辦，無非要減少它在政治中惡的勢力。我並不是說報紙是種獨佔的事業，所以應當國辦，但爲澄清政治中腐敗的現象，我不得不主張消滅有經濟勢力爲背景的報紙。報紙國辦的先例，我們雖然沒有看見，但部分的試驗，則到處都在舉行。美國有聯邦規定政黨的宣傳品，由公家出資付印，這不就是政治新聞紙國辦的先聲麼？

在大家對國家的信仰已經掃地無餘的時候，我忽提出報紙國辦的主張，這自然不會受一般人的歡迎。現在似乎有一種復古的傾向，大家相信與其放大國家職權，還不如縮小來得穩當。這實在是對國家失望以後必然有的結果。歐戰以後，無論那一個國家，都在險惡的風浪中掀扎它的生命。經濟的恐慌，失業問題的嚴重化，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在在使吾人於痛苦的回憶中懷疑現在的災禍，都是受提倡國家主權論者的賞賜。「以往的過失，都應當由政府擔負罷？」「以前若祇予政府以有限的權力，現在災難或者不致發生罷？」各人都暗暗地在這樣想了。在這種時候，我還要提倡紙國辦，一般人不會嗤之以鼻，而說我犯了神經病麼？

但我前面已經說過報紙國辦以後，未見得會比商辦時期更爲腐敗。而我們要報紙從私人的工具，變成衆人的工具，事實上非收回國辦不可。現代國家的危機，決不是國家單獨造成的。而整個社會制度的崩潰，當爲今日種種禍患的主因。我們不應單獨責備國家的措置失當，而忘掉整個社會制度的崩潰，實爲國家措置失當的原因。社會新制度的建立，國家的情形還

能這樣腐敗麼？那時國辦的報紙，非但不致爲一黨一階級的機關報，我們人民亦許還多一個監督的機會。

報紙國辦，不過使報紙經濟獨立，並不能說因此即可減除它一切腐化的勢力。言論自由的保障，恐怕亦是使報紙有價值的一個先決條件。發表意見的自由，倘使要受任何一方面的限制，那這種地方的報紙，祇是爲有力者宣傳的機關。不能是輿論的記錄者的。聽憑各方面發表他們獨立的主張，這才有毫無顧忌的討論，有毫無顧忌的討論，這才有健全的輿論。我沒有看見言論不自由而會有健全輿論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意志，假使不能像大自然中飛鳥那樣自由，那我們最好不要談什麼公意，也不要談什麼輿論，因爲這都是野心家借來遮蓋他們罪惡的名詞！

一講到言論自由，話又得多啦。因爲這自由就有難於解釋的意義。我們不必談個人主義的自由，也不必談進化論者所說的自由，更不必談唯心論者所說的自由，我們就是擱開這許多理論造成的雲霧，仔細看一看現實界的情狀，我們實在亦難找到自由的一定解釋。我們若把自由解作放縱，那社會中還會有什麼法度？而像唯心論者那樣解作服從倫理的意志，那恐怕自由又要變成不自由了。有人說：自由是在法律的範圍以內不受干涉，這亦許比較是近於情理的解釋。

假使說自由是在法律範圍內不受干涉，那言論自由就是在法律的範圍內可以隨便說話。不過此地的法律，決不是一二野心爲自己的私利而造的。若是法律就指現在專門替有勢力爲虎作倀的東西，那我們的言論自由，不啻就自己戴上了枷鎖。我們的所謂法律，乃是人民自己願意服從的。它必須經過合法機關的通過，而也有個合法機關在那裏執行。

爲什麼要有好的報紙，一定得允許在法律範圍之內，隨便人民說話呢？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報紙就是人民說話的地方，若不准人民說話，那不如取締報紙來得乾脆了。現在的國家，往往既不願擔負惡名，取締報紙，而又不准人民說話，恐怕洩流了它黑幕後面的真象。這實在是太不澈底了。而人民也似乎以爲有了報紙，就於願已足，不再作進一步的要求，使事實的光芒，不能照遍了黑暗的社會。這都是不很對的。我們若不把國家加之於言論自由的枷鎖毀棄，那報紙祇是爲治者宣傳的機關，這是極明顯的。我們把發表自己主張的工具，反讓治者利用爲欺騙我們的機關，這是愚蠢而可以痛心的。輿論，它一定要在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才會產生，失去了言論自由，就等於失去了造成輿論的原素，這我們是不可以不注意的。我們的所以有輿論，因爲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意志，以及自由的討論；而我們的所以要輿論，也無非因爲它把各個人內心的要求表示出來。言論的不自由，不但消滅了輿論的價值，而且也妨礙了輿論的產生。

報紙的任務，我們說它是輿論的記錄者，但如果社會中沒有輿論，它也當然就無所記錄了。國家檢查新聞的權力，使不利於當局的言論，不能在報紙上刊登，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自然不能在報紙上看見輿論了。要是有，也那無非是無恥之徒所上歌功頌德的表章。由是報紙中充滿了偽造的消息，着色的意見，我們最多可以把它做消遣的伴侶，而絕不能從此得到政治的智識了。

言論自由的保障，這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口號，但因爲它特別對權威階級不利，所以雖是公認的原則，不會得到誠心誠意的推行。我在此重新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不禁嘆息賢明治者的缺少。

(三) 餘話

最後，我亦許還應當說說改造經濟組織以及更改教育宗旨等更爲重大的問題。我們誰亦不能否認現代政治中的許多罪惡，應當由貧窮和愚蠢這兩個魔鬼負責的。不是貧窮，人民不致喪失他們的政治自由；不是愚蠢，人民也不會聽憑一兩個政客撻弄是非。所以不先驅除這兩個魔鬼，污濁的政治是不能澄清的。但要驅除這兩個魔鬼，我又相信不是改造經濟組織和更正教育宗旨，不能建功。貧窮何由產生，愚蠢爲什麼永遠是遺留於人間惡性，要討論這兩

個問題，恐怕就是寫了比這本書兩倍長的文章，也不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簡單的說，我們一定會相信貧窮由不良的經濟制度造成，而愚蠢是不良的教育制度養成的。雖說人口與食品不等的增加，天然產物不經濟的利用，同為造成貧窮現象的原因，而富者佔有生產機關，不能說不是善於養育貧窮這魔鬼的褓母。雖是說人性的遺傳，或者是愚蠢能保留到現在的一個因素，但教育的沒有竭盡其功用，也不能全辭其過錯。我們試虛構一理想的社會，其中有穆亞（More）的生產制度，虛構的教育機關，那個社會中貧窮和愚蠢的問題，還會像現在這樣嚴重麼？

經濟組織的改造，以及教育宗旨的更正，雖極有助於肅清政治罪惡，而間接的有助於發展選舉和代表制度的效用，但此地竟沒有討論它們的地位。這兩個問題實在太複雜了，我們不必撫拾它們的一鱗一爪，來佔據此地有限的篇幅。

我還有一點應附帶向大家說說。我在這一章中僅僅提出限制政黨和報紙的惡勢力兩點。這並不是能實踐此兩種條件，選舉和代表制度，即可施展它們的理想而毫無阻礙了。我相信社會的組織至為複雜，而其相互間的關係，又極精微，幾至無從辨識。其他有影響於選舉和代表制度的社會背景，不知還有多少，而所以祇提出限制政黨和報紙的惡勢力為補救的條件者，不過因為它們影響於這兩種制度比較的重大而已。我願意把這兩點為改進選舉和代表制

度的起點，而並不說能做到這兩點就算達到目的了。這種意義，我相信聰明讀者早已清楚，不必再費我粗莽的筆墨了。

註¹ 關於改良選舉票的問題加以討論的，我可以舉下列的幾篇。

Short Ballot, Edited by Pullock, Kerman G: Defeating The Australian Ballot by The "assisted"

Vote, in Outlook, Feb, 23, 1901, p. 432 off. Childs, B. S: Ballot Reform, Need of Simplic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ssociation, Vol, vi 1609, pp. 65—70

The advantages of Massachusetts, Dana, Richard Henry, The Form of Ballot, City Club,

Bulletin, City Club of Philadelphia, April 21, 1910.

註² 主張減少選舉次數的，如 Beard: ballot's burden,

註³ 討論歐美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我可以舉：Commons: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Hoag,

Clarence Gilber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H. Will, Georg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benoit;

Pour La reforme Elect rate; p. n. d. n. x: La representation pro fessionelle.

註⁴ 討論創制和複決制度者，我可以舉...

Selected Articles on the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Compiled by Edith M. Phelps.

The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Edited by William Bennett Munro,

註 5 美國各邦兩弊法規的情形見 Sikes: *Corrupt Practices Legislation*, Appendix, p. 28—261.

註 6 墨菱和哥斯耐兒調查放棄選權的結果，選民中因自知其選舉票不生效力而不選舉僅佔百分之二·五。這個數目或者是不很可靠的。

註 7 墨菱和哥斯耐兒的統計表告訴我們，放棄選權之中，有百分之四，三，因厭惡政治；百分之二，〇厭惡他已的政黨，百、之〇，七相信票箱有弊端的，百分之〇，四不信任政治行爲。

註 8 主張限制競選費用的文字很多如：*Common Expenditure and Publicly, Bourne's Speech in U. S. Senate, Thursday, May 5, 1910; P. 13. (Jan)*

Sikes: *op cit.*, ch. 7

註 9 美國一九二〇年之競選費用，共和黨用掉近九百萬美金，民主黨亦一百萬，合計一千萬。

英國三大黨的競選費用，在一百萬鎊左右。德國之競選費用，亦及二千八百萬馬克。*Pollack: op cit.*

Page 1, and page: 216

註 10 潘洛克 Pollack 常常爲英德的競選費用作辯護。他說：這許多錢是用來做有利於教育的事業的。但我相信政黨固然用它的財富來印刷宣傳文字，但用於不正當用途的，恐亦不在少數。

註 11 德國候選員所需費用，自然不一定都要五萬馬克。社會民主黨和天主教黨的候選員，他們所用的錢，大概當在五萬馬克以內。不過這五萬馬克可以說是德國的標準數目，因爲它大部分的候選員都得化費掉這麼多錢的。

Pollack: *ibid.*, pp. 219—220

註 11 *Id.*, p. 91

註 12 此項法規，業已經過數度修改。按照一九二八年最近之修正案，則選舉區候選員最多費用，為每選民十分，而選舉市之候選員為每選民十二分。參閱 Ogg: *Engl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p. 292.

註 13 亞斯麥斯 Asquith 於國會中曾說：我們不應當反對捐輸政黨經費，除掉用經濟的工具，我們實在不能進行選舉的競爭。In *Pollack's Money and Politics A broad*, p. 12

里波爾斯且爾 Ribbald: 爵士亦說：錢愈多，政黨的組織愈完備。我們如果說政黨是必要的，那讓它們有豐富財源，比給它們於枯窘的地位要好些（全書二十五頁）

註 15 全上三頁。

註 16 Mauro: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 ch. 14. *English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progress,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page 259.

註 17 W. H. Taft: *Popular Government*, pp. 96—121

註 18 Charles A Dawes: *Need of Reforming the Primaries*

註 19 Merriam and Ovracker: *Primary Elections*, ch. 9, *The Practical Workings of Primary*, pp.

809—246.

註20 全書

註21 卡培補一七八八年於第戎 Dijon 降生。著有 Voyage to Icaria。其思想極為激烈。一反傅立葉 Fourier

聖西門 Saint Simon 諸人精神，而與巴倍夫 Babent 瑪萊 Morelly 成一派焉。生平學說，畧見 Hertzelt

The History Utopian Thought

註22 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葉，殆為理性主義最盛之之時期。若傅立葉也，若瑪萊也，若歐文 Owen 也，

莫不謂人類乃有理性之動物，能任其性之自然 Free Play of Passions，則快樂之世界立現。卡培補受其影響，亦深信人為有理性的動物而不疑。

註23 Bennett Hall: Popular Government, ch. 2, pp 25-45

再生雜誌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民族觀點上中華歷史時代之劃分及其第三振作時期.....張君勸

倫敦經濟會議散後之各國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諸君來

何謂國民所得？.....張君勸

選舉與代表制度.....公度

古希臘學者與今世科學文明.....嚴文海

陶鼎論中國政治.....馮森

愛國主義 (P. Crosby 原著).....楊祖森

中外大事記.....冰森

經濟史觀

Henri See 原著
錦柏重譯

第一部 馬克斯主義之原始及其特性

第一章 主義之原始——共產宣言

唯物史觀者，以人類社會史中之一切現象，均受經濟現象所支配之學說是也。此學說爲馬克斯與其友安格斯所著，而其原理，則或有取義於他思想家之說焉。

吾人於此可簡單追溯此學說於彼二人腦際所以漸成具體之跡，今且先說馬克斯。馬氏初本爲攻黑格爾哲學之一熱心學者，於康德哲學亦然。是以吳德曼（Wolmann）謂馬氏哲學及其唯物史觀，大部分源於德人之哲學者，即以此也。

一八四二年，馬氏經理萊茵日報時，其思想與當時習黑格爾哲學之急進青年，似無若何重大區別，迨一八三七或云一八三八年時，彼於致友人書中，則嘗引用唯物論的辯證法焉。對於經濟問題亦已逐漸注意。吾人猶憶馬氏每於萊茵日報爲文斥法律學派之不當，蓋此派以爲任何法律制度，由於長期的演進之結果也。

萊茵日報既被官廳封閉，於是馬氏之巴黎，與被放逐之德共產黨人及法之社會主義者相交遊，遇從甚密。一八四四年，與盧西氏（Arnold Ruge）創德法年刊，吾人由此可知當時其思想之變化爲何如矣。馬氏曾闡示第四階級或曰無產階級之革命何以爲必然，蓋經濟之重要，視政治問題爲先也。彼視法國革命之重要，不在其能解放政治力量，而在將經濟之基礎動搖，此經濟基礎，乃政治的上層構造據之而建立者也。

先是馬氏爲黑格爾之信徒，與當時習黑格爾哲學的急進青年之思想初無二致，迨一八四四年，吾人讀其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一書，馬氏已與黑氏之道相離矣。唯物史觀之概念，即成於是時，一八五九年，經濟批判出版，書中緒言之結論，曾於一八四四年發表。曰：

「人類在社會的生產中，加入於種種特定的必然的離人意而獨立的生產關係中，此種生產關係，與生產動力（即手工或機器之類）之特定進化階段相應合。生產關係之全部組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此即爲社會之實在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乃有法律的 political 的上層構造，對於此項基礎，更有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之應合。……故不得謂人類之意識，決定人類之存在。而應謂人類之社會的存在，決定人類之意識。」

馬氏嘗謂社會生產力與法律關係之衝突，終有其時。所謂法律關係者，即財產制度是也。

「到此時期，則財產制度遂成障礙物矣。」「經濟基礎之移動，遲早終將此龐大之上層構造傾而覆之。在一切變動中，此二原素，須分辨焉。同時，較勝於現在之生產關係，非俟新社會中之物質基礎發達後，決無由起而代之也。」

此時馬氏之概念，受費爾拜克（Feuerbach）之影響特深，蓋馬氏固嘗篤信此淵博的哲學家之思想者也。但終則背叛之，且斥費氏不知宗教的情感之本身，乃社會的產物，彼之唯覺論者之概念，澈底言之，不過一唯心論者之學說耳。

安格斯曰：馬氏乃唯物史觀之首創者，彼不能分享其成。是說也，安氏毋乃太謙遜乎？以吾人所知，一八四五年安氏所著之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概況一書，其描寫英國勞動者之狀況，固可讚賞，而所持論，且爲馬氏學說奠具體之基礎，其敘述實業革命也，栩栩欲生，以及此實業革命何以產生「工人無產階級化」既明且確，當自由競爭之風行也，四面八方發生仇視與衝突，中有二階級，其互相仇視尤烈，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也。安氏並於「資產階級」下一正確之定義，曰：資產階級者，包括以下之數者：曰持有財產者，曰地主，曰製造家。

資產階級所孜孜者，唯利是圖耳。人道主義者之情緒，不足以感之。安氏引新貧民救濟律以證之，彼且引伸而詳釋之如黑漆一團然。彙之，實業與資本的集中，日益顯著，財產漸

次集於少數人之手，而工人之「預備軍」(reserve army)日益擴張，此所以社會戰爭終不免也。是以謂馬氏之全部學說，已早見於安氏之著作中，未為不可。所謂階級鬥爭，彼又曾正確言之，謂社會僅二階級耳，或為兩個經濟的抽象分體，曰資本，曰勞動。安氏曰：「製造家者，資本也，勞動者，勞動也。」

凡此皆具體原理，所以增益經濟唯物論的哲學之論據者也。觀點如此，馬氏之與持唯情論之社會主義者脫離關係，且詆之為烏托邦者，此自然之事。此唯情論之社會主義者，大抵為法之理論家，尤以蒲魯東(Proudhon)為最。馬氏於一八四七年，著哲學之貧困一書，雖難亂無章，然却極盡詆醜之能事。

馬氏曰，所謂財產者，端賴乎生產方法，非如法家及形而上學者謂其為抽象的觀念。又曰，彼之學說最合乎科學。安德勒氏(Andler)曰，馬氏之著作，非彼之獨創，獲益於學者之思想處尤多。最著者，如曾被馬氏攻擊之蒲魯東氏，莎期孟德氏(Sismondi)李斯德氏(F. List)尤以柏古氏(Pequieur)為最，蓋柏氏曾著商業之利益一書，極注重實業之集中，機器之實施，與中等階級之社會勞動化也，之數者，影響馬氏尤鉅。然馬氏之著述，綜合之才能，推理之力，與氣勢之雄，終有以掩蓋他人之作耳。其他思想家之作品，創作之能力，固未遜於馬氏，然氣勢則不及之耳。

凡此思想之激盪，姑勿論其如何，結果終成一八四七年名震一世之共產宣言之鉅製，而無濟唯物主義之論，自是與天下共見矣。

此鬥爭的宣言之開始申述也，不以原理爲據，而以歷史觀察爲言，事至顯著，而唯物史觀之義，明定於是矣。其學說又遂由彼推演之方，而成階級鬥爭之義矣。其言曰：「所有社會的歷史，自始至今，只是一部階級鬥爭史而已。」

此敵對之事，在各時代中，層出不窮。然資產時代所示之特徵，在於減少爭鬥之階級，而使資產與無產兩對敵之階級存在耳。

此宣言對於資產階級時代之原始，又進而爲之寫真。謂海外新地之發現，新器具之發明，遂爲此階級開創局面之資，而資本主義之發展，結果又成爲大規模實業之演進。於是此現代資產階級，遂爲生產方法與交易方法於連續不斷的革命中之產物矣。在昔此資產階級固未嘗無革命之功，「封建之關係也，家庭之關係也，游牧之關係也，曾爲其所踐踏矣」，而彼所實現者，又爲「無恥的，直接的，血殘酷之剝削焉。」彼之貢獻所示之特質，則又在于使「生產與消費之方式，在各國趨於一致焉。」

雖然，今非昔比，「向者生產力量，俱爲資產者所掌握運用，今若用之以維護其產業地位，已不可能，蓋彼既已發榮滋長，遠超乎資產者所有權之狹殼範圍之外也。若仍以此種所

有權支配之，是桎梏之而已……。」坐是，則資產階級適自製武器，將用之以自毀，而又造成無產階級以爲此武器之運用者焉。」

無產階級之擴張，方興未艾，而小資產階級，如小製造家，如商人，如工師，以及小地主等，已在淘汰之中。蓋資本與生產器具兩者之缺乏，已決定其經濟不能獨立之命運矣。

先是工人所反抗者即資產者之仇敵，如專制魔王也，封建之大地主也，今則又起而與資產者抗衡矣。斯真所謂「歷史之回流」。今之無產者日漸組織，以成階級，又已可概見。

於是今之無產者，對於歷傳之分配法則，所以從事破壞者，蓋歷史進化有以致之。資產階級之傾覆，無產階級之勝利，已成勢所必然，奚可避免？共產宣言中舉以告資產階級者有言曰：

「資產者之經濟思想，非由於資產者之生產條件及財產而起乎？資產者之法律制度究何物乎？無非以一階級之意志爲根據，制成法律，以強人人奉行之而已。——此意志之特性與意向，均以維護資產者之一階級生存之經濟條件而定也。」

馬氏之社會與政治煽動計劃之梗概，實已載此豪壯之共產宣言中，于此可以見矣。馬氏與安氏之晚年著作，不過以宣言中所言者，加以啓發與解釋耳。

凡此所顯示者，誠如賴布里奧萊氏（Anonio Labriola）所謂此歷史之「新觀念」，尤注

定有實際的結果，蓋其斷於闡明共產制度勢在必成。其言曰：「社會之將進於共產主義，蓋憑其進化之固有律也。」

第二章 學說之定義及其特性

馬克斯與安格斯之據唯物史觀所了解者爲何如，吾人今可進而求一明確之觀念矣。彼等之學說概以任何歷史上之事實，無不爲經濟現象所支配，而以經濟現象解釋一切者也。一切法律與政治體制，一切智力事實，如文學，如藝術，凡此上層構造，俱爲當時歷史學家所重視者，均由經濟基礎所決定。此輩歷史學家除意識形態外，茫茫然，一無所知。然意識形態乃根本現象之唯一產物，而與滿足人類基本生存及再生產有關者也。

馬氏與安氏以爲凡此一切表面的或意識形態的現象，自有某種意義與重要，其於經濟基礎中所表示者尤然。其實，歷史中之顯著事件，不過啓示經濟構造而已。諸如戰爭，外交事件，宗教的進化，甚至智力的本身之變動，亦僅能以經濟生活解釋之。所謂歷史上每一時代之政治鬥爭，不過階級鬥爭之表面的顯示而已。雖曾有英雄豪傑爲驚天動地之事業，實則有如戲中之木偶，其真正之意義，反不知也。賴布里奧萊氏於此明示吾人曰：

「馬丁路德，一如其他之改革宗教家然。其同時代者對於馬氏之認識，遠不如今日

之吾人。所謂宗教改革者，不過第三等級之發展中，日耳曼民族反抗教廷剝削之經濟革命中之枝葉耳。然則視彼爲何如人，直一扁勳家，一政客耳。以其利用信仰而自爲教主，於階級運動中，予以扇動的刺激，意在回歸真正基督教，在通常狀況下必要虔敬而已。」

馬克斯與安格斯及其信徒，深信唯物論最合乎科學，亦唯用此唯物論，然後始有史的發展定律之可言。關於此點，安氏爲一八五五年出版之拿破崙不魯美爾第十八作一序言，頗饒意義。曰：

「馬克斯乃發現史的活動律之第一人，即凡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或其他意識形態範圍中之歷史的衝突，實際上，不過社會階級間之衝突的固定的轉變而已。此階級之生存，與夫階級間之相互衝突，爲經濟條件所發展之程度，生產方式，以及源於生產而生之交換方法所決定。」

安氏又曰：「此定律之於歷史，有如力之轉變律之於數學的科學，同其重要。」賴布里奧萊氏亦曰：「精密的共產主義之所以可知未來者，以其所言所測，爲歷史內在中所必然的發生也。……」

嗣後，安氏於學說會有相當之修正。安氏曰，不論馬克斯抑余，未嘗主張經濟的下層構

造，乃唯一之重要現象。但凡構成上層構造者，如階級鬥爭中之種種政治的外觀，法律的方式，政治的與哲學的原理，宗教概念，歷史上之大事，甚至經濟現象，俱由經濟的下層構造爲其基礎，且居於恒動與反動，此則無可諱言。安氏亦嘗藉經驗修正其意見，此或未能完全實現。但上所云云，以及信奉馬氏者如賴布里奧萊氏與賈德斯基氏所解釋者，無論如何，要不失爲馬克斯學說之一。安氏復有二函，一在一八九零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其中有言曰，彼意以爲橫於政治與法律現象之下者，甚至宗教的與哲學的概念，俱爲經濟現象。所謂政治，法律，宗教，哲學，不過「經濟的反影耳。」經濟演化且常居統制地位，因偶然事件或爲個人所活動者，彼亦不抹殺，但「偶然」所生之事件，往往即爲經濟上所必然者。假令世無拿破崙其人，或另有一拿破崙替而代之。是以科學端賴乎「條件與技術的必需品也。」

第三章 學說之應用

歷史能視爲正確科學乎？誠爲問題。但吾人雅不欲於此時有所論列。惟吾人所敢云者，即當共產宣言問世之日，安格斯與馬克斯於歷史的研究，未嘗學問，蓋歷史研究之界域，爲彼輩前所未聞也。彼輩僅注意當時之大事以成其說耳。

彼輩多以近事爲其學說之張本。年深久遠之事件則少注意。一八五〇年，馬氏著法國階級鬥爭一書，其描摹法之各階級，栩栩欲生，更圖說明彼時一切政事，俱爲此數階級間之鬥爭所支配。依彼研究所得，此階級鬥爭，非僅有產者與無產者兩階級而已，他若理財家，製造家，商人以及低級的中產階級間之利益，常互有衝突。拿破崙不魯美爾一書中，意亦云然。至於無產階級中，孰爲實業的工人，孰爲農業的工人，不可不爲之分辨。關於此點，馬氏之思想，似有思路不清之弊，蓋彼於小農階級之社會的及經濟上之地位，不甚了了。馬氏語吾人曰：「雖當時有衆多之資產階級，拔拿伯（Bourgeois）要不失爲小地主階級之一代表。」繼又曰：「質言之，此輩小地主，雖同爲經濟條件所支配，未嘗形成一階級，以其不能構成堅固之團結與全體自覺也。雖有多數小地主於改變之際，起而作反叛政府之舉，然其所以如此者，由於其財產抵押殆盡，致降而爲無產階級，不復享受如曩時資產階級相等之利益所致。然此作亂之農民，應屬何種範疇，應有澈底研究之必要，當馬氏執筆之際，不此之圖，往昧於當前之大事，是以其文也，雖明晰而有力，然結論終不免流於臆測者，亦以此也。」

馬氏於同一書中示吾人曰：「工商業也，中等階級之職業也，於強固政府下之必能發榮滋長，如花之在暖房中然。」是言也，或許正確，然有待事實之證明。

馬氏曾於一八五一及一八五二年，藉其社會階級之理論，以書信之體裁，描摹中歐之革

命，載於紐約日報，後刊印成書曰「革命與反革命」，或曰「一八四八年之德國」，爲馬氏之重要著作，其中有告吾人者曰，各階級之狀況，德國何以不同於英法，因封建貴族之頑固，堅持其領主的權利以壓迫農民，有以使然。大規模工業既不振興，是以低級的中產階級佔重要地位。迨一八四〇年以後，因工業之進步，始有所謂資產階級與舊封建集團相抗之事。

馬氏又曰，法國革命乃必然之事，縱無一八四八年之二月叛變，亦無倖免之理。蓋當時除貴族與文武官吏外，其他階級莫不仇視政府也，此反抗之集團，爲各階級構成之混合物，然革命終不免於失敗者，亦以此也。一八四八年四月，高級的中等階級，聯合封建的貴族與羣衆及小商人作殊死戰，一八四九年五月，且蔓延於德之西南部，當時工人乃真正出生入死之戰士，雖有農民與之聯合，低級的中等階級之參加，正因後者之無能而懦怯，終於七月不免慘敗，而佛蘭克府議會，亦因而消滅，於是此革命之幕閉矣。馬氏此文，惟有一事，吾人須承認者，即當其着重階級鬥爭與經濟原素之際，於其他因素，未嘗忽略，論奧之革命尤詳。其抓住現實之才能，尤爲非凡。

同時，一八五〇年，安格斯研究一五二五年之農民戰爭一書，蓋在搜集例證，證明唯物史觀之恰當。安氏以爲宗教的原因，實無足輕重，要以表明幾個社會階級之相互作用爲要。此言也，雖非安氏一己研究之所得，即此一端，已合乎科學矣。謂此爲當時善用科學方法之

最佳著作亦無不可。

嗣後，馬氏於資本論中，假歷史以解釋「資本家積聚說」。凡書中所言，其眼光之銳，知識之博，尤不容吾人非議，其目的在證實共產宣言中所言之不虛。吾人讀資本論第二十六章，即可瞭然。其言曰：「資本主義之經濟程序，胚胎於封建的經濟程序，質言之，後者之構成原子爲前者所解體是也。」又曰，在以工資度日者獲得勝利之前，農奴已獲自由，於是勞動階級奪其生產工具。馬氏此言實缺少證明。在同書第二十七章中，亦最佳之一章，描寫英國農民如何被資產階級掠奪之經歷。要而言之，此章所言，較之下章所謂「殘酷的立法爲掠奪者後盾說」精確多矣。蓋彼純然誤解圖德（Tudors）王朝之立法及其行政之特性，殊不知圖德王朝之立法及行政，非但不有摧殘勞動階級之事實，且力爲之保障。此類謬誤，由於馬氏執筆之際，於史的研究，解釋不當所致，更因假定的概念，以爲凡歷史上之事實，具爲經濟現象所支配一概念所囿是也。圖德王朝之君主權力，鞏固猶昔，富有土地之貴族，焉能竊其權。迨一八六六年之革命後，此權落於縉紳之手，乃漸失其統治權力，此爲習近代史所共知者也。資本主義亦非倡於十六世紀，或甚至十七世紀，此尤不容忽略，蓋彼時小工業制度依然倡行。

馬氏於「資產農人之原始」及「工業上農業革命之反動」之二章中，自有其不可磨滅之

真理，不乏精深開明之見解。雖然，馬氏文中之變化，過於簡潔，質朴固無論矣，以致有浮而不實之弊。其闡揚真理處，多夾雜而少理性。吾人之印象，即對於演繹之原理，在指示整個之進行也。

「實業的資本之原始」之一章，為書中之最佳者。其中最堂皇之數頁，如論發現之效果也，新大陸財富之開拓也。殖民制度之真諦也，當與土著之無情的剝削也，凡此具為英之白種工人開一剝削之途徑。馬氏且為之結論曰：「歐洲工人，名為以工資生活，實同於奴隸，為鞏固其基礎起見，此後新世界，應將此奴隸身分，澈底而澄清之。」此誠名言證論，雖有已為歷史所修正，然就大體言之，要不失為真理。

復次，馬氏雖於資本論中，孜孜於唯物論者，其意不在證明學說之健全。蓋在建立真理，質言之，在立一明顯之真理也。資本論一書，意在擁護集產主義者之見解，而證明資本源於掠奪工人之勞力而成，因其有剩餘價值，其所以能繼續作用者亦以此，此剩餘價值，即榨取工人大部分勞動的生產。實則馬克斯學說，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此為精研馬氏學說者所同意者也。

第四章 唯物論的演繹性

馬克斯之定命論，初非由其體歷史中體驗得來，僅為一種演繹的概念之結果耳。此吾人開始感覺如是。同時，此定命論，亦為扇動家如馬克斯與安格斯之流，以之為扇動的工具。此誠一既實用而又易感人心之武器。是則，彼輩非為擅研真理之單純的學者也可知矣。

賴布甲與萊氏於此有一公平之敘述，曰：

「吾人之學說——乃胚胎於共產主義之戰場中者也。蓋在推定現代無產者，有登政治舞台之一日，現代社會之根源，容吾人對於資產階級所構成之危機改造之。此學說之為革命的，吾人可從兩點觀察之，因其為醞釀中之無產階級建立革命的理論及其發展之方法，因其意在探討過去一切社會革命之起因及其發展之情形。至若階級間仇視之所以達某種危急之點者，因生產方式與生產力之發展間相抵觸故。凡此所言，非盡在於是，吾人視此學說為歷史上一切危機之總結可也。」

吾人欲論馬克斯與安格斯之唯物史觀的思想歷程，精密言之，雖不易，但其學說之形成，至少受德之形而上學說之影響，尤以黑格爾之辯證法為最，此固不容吾人否認。

是則吾人實有回溯黑格爾論理學的特質之必要。依黑氏意，每一「正」，必有「反」，「合」。每一命題之否定達一較高之「正」。茲姑引黑格爾信徒馬克托加氏（MacTaggart）之言曰：

「思路之不定，如船之轉蓬於逆風中航然。」黑格爾謂其辯證法程式，於

學問之一道，非但不有扞格不入之處，且於所得者，可從而廣博之含著之。實則謂兩重否定祇有回歸「正」而已。賀汾汀氏（Hoffding）曰：「此著名之辯證法，不啻一魔術的表演。黑格爾應用辯證的抽繹至於實在，其本性即辯證法之證明。一切科學須用同一之方法。」

「此辯證法於史的應用，不若自然科學之易。麥亞孫氏（Meyerson）曰：「黑格爾達實在之概念，彼之純無時間成分之宇宙，絕無任何變的觀念於其間」。托羅希氏曰：「黑格爾所建立者，爲具體歷史不有演繹的概念，彼廓清時間之成分，若余可言，蓋彼所力求者，乃「唯理論的」歷史，而着重者在其論理的方面。」

馬克斯受黑格爾辯證法之影響，似無疑問，托羅希氏亦曰：馬克斯所銘刻於心者，曰革命的精神，曰自然主義論，尤其是經濟概念。是以黑格爾主義，就右傾方面言之，在促成國家之專制，就左傾方面言之，在級階鬥爭之概念。托羅希曰：此類概念即馬克斯主義論理學之結果，亦即唯物史觀之所以產生也。

馬克斯否認其爲黑格爾之忠實信徒，彼於資本論序言中曰：「余之辯證法，不僅與黑格爾相異，且與之適得其反。黑格爾以思想歷程，乃現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現實世界僅「意念」的外形而已。彼甚至以思想過程，於「意念」名稱下，轉變一種獨立的主體。余意則不然，要知所謂理想也者，無他，乃人類頭腦中所反映之物質的世界，轉變爲思想的形式而已。」

馬克斯又曰：此辯證法之於黑格爾，終成其廣博而自覺之事業，未嘗稍受妨礙，事誠神秘，在彼自當興高采烈。但果欲於神秘的幌子中，發現合理的核心，吾人非反其道行之不為功。蓋神秘的論理適合資產階級，理性的論理，始有精密的，革命的之可言。「因理性的論理中所包含者，一方面認現存之事態，同時，又認此事態之否定，其崩潰必不可免也。」繼又曰：「資本主義社會運動中之自在矛盾性，於規律的循環期之變化中，影響資產階級尤為顯明。雖有現代工業之經營，然其所達之極點，乃普遍的恐慌而已。」

就吾人所知，馬克斯之辯證法，因脫胎於黑格爾者也。黑格爾的生氣流露於馬氏著作中者，尤以資本論為最。吾人更可隨處發現矛盾的觀念，反對的態度，使變為新而超然之形式。關於此點，資本論第三十二章中最有特性之一節，曰：

「資本家之佔有，資本家生產方式之結果，產生資本之私有財產，亦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個人之私有財產之第一否定也。但資本家之生產，因自然法則之必然，致生自己之否定，此乃否定之否定。此否定非於勞動者私有有所復興，而是以資本主義時代之獲得為基礎，即以合作，土地與生產方式之公有為基礎之私有財產而已。」

馬克斯於其一八四七年所著「哲學之貧困」一書中，痛罵蒲魯東氏者，不在其引用黑格

辯證法，而在其誤解與誤用耳。同時，蒲氏於經濟之矛盾一書中，於「正」「反」頭頭是道，獨於「合」之一端，隻字不提。

馬克斯曰：「黑格爾未有問題提出，僅有一辯證法，而蒲氏於黑氏辯證法所事者，僅其術語耳，彼之辯證法運動，僅善與惡之武斷的分別耳。」

當吾人企圖解決問題而去其不佳者時，「吾人間斷辯證法運動。」

馬氏之有突變概念，景象之顯明的轉移，以及馬氏最喜以一貫之歷史，強分為若干期，黑格爾辯證法應負其責。亦唯歷史之合理化，往往忽略真正事實，正因彼輩過於寶貴馬克斯學說與黑格爾論理，而不圖合於理性的範疇也。

同時，貝爾斯坦 (Eduard Bernstein) 明示吾人曰：此辯證法之引用，實予馬克斯掩飾其理論上之某種矛盾。一方面，馬克斯深信資產階級社會之生產力發展成熟時，社會主義體制乃必然之結果。另一方面，又不欲棄其以一種政治手段實現布蘭克主義者之 (Blanquist) 沒收觀念，為無產階級謀利益之方法，此乃一種極幽明之矛盾也，一種「二元論」也。假令黑格爾辯證法未嘗使馬克斯陷於此矛盾中，吾知聰明如馬克斯者，必起而否認。貝爾斯坦曰：馬克斯主義的健全部分，未嘗有賴於辯證法。關於此點，彼曾有一不易翻譯之成語曰：「以辯證法求真理，有如以燐光照黑暗。」

是則唯物史觀者，大半係一種演繹的概念，形而上學的，一種理想主義的觀念。此敢斷言而不容推諉者矣。

馬克斯之觀察事物，往往以彼為唯一之經濟學者，其評古典學派之經濟，極盡謾罵之能事，不曰理論上不周，即曰邏輯上欠通。但於古典學派之所謂支配的定律，——此或非指永存的定律而言，而是經濟現象之科學的定律之一點，表示同意。此乃一種錯覺，吾人殊難除其根，政治經濟能觀察事實，承認某種趨勢，表述假定，但吾人能謂經濟的定律較之歷史的定律尤為合理乎？要知政治經濟愈富有史的意味與方法，愈不能望其有如自然科學之支配的定律也。縱馬克斯為一經濟學家，要非一單純揮研真理之學者，謂其為活動家，允稱恰當，

同時，馬克斯之觀察具體事實有銳敏之眼光，有抓住歷史大事之技能，此其文章之所以有魄力，有氣勢。彼往往以此類大事就其一己之觀念，在某種方面，自有其科學的精神，是以唯物史觀非僅一種智慧的策略，魔術家之技巧，如黑格爾哲學所表演者而已。其學說雖不免有謬誤，要亦含有充分之真理，故曰，不僅為活動的方法而已，亦促進史的研究之有力的鼓勵物也。

克魯謝 (Benedite Croce) 曰，馬克斯置歷史於新視線之下，其功不在小，凡為馬克斯精神所陶冶者，「有如一患近視者，架一良好之眼鏡，則其所觀察者，自有霄壤之別，本為

神秘者，而今無不現其原形矣。」

馬克斯與安格斯之探討經濟事實，頗有高深之見解，即較之以道德條件爲要務之大儒如卡爾爾氏（Gartley）亦有過之無不及。關於此點，吾人讀一八四三年所著之「過去與現在」一書，其描寫英國勞動者之可憐，貴族之自私自利，工業的貴族也，頑固的鄉紳也，靡不饒有詩意，誠亘古所未聞，亦未有崇拜財神如彼之痛心疾首者，彼之理想在過去而非將來，觀其所畫之聖愛蒙德斯寺管理鄉村圖，已可知矣。卡氏亦嘗主張以立法干涉工業事業之必要，勞動之考績，公共教育等，應由國家經費負擔之說。彼忠告英國民族，天性如是保守，必須斷然改變此可惡的事態。彼雖亦主張自由與平等，非貴族，然此有如僞貴族之不可能。在彼以爲貴族與牧師，爲整個社會中重要分子，此種極端個人主義者以爲欲救世，只有望於英雄，與自私者崇拜財神者相搏之真英雄，而非能與外族血戰之英雄也。

第五章 科學與烏托邦

根據上所云云，吾人深信，不論馬克斯之唯物史觀，抑社會主義者之理論，（或鼓吹的理論）如何如何合乎科學云云，但以吾人觀之，要其程度決不能如彼輩所深信者然耳。

姑以馬克斯之社會主義而論，當其極力攻擊其前哲之所謂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時，尤以攻

擊法國理論家爲烈，然此之攻擊，馬克斯得毋稍有誤解乎？就中首當其衝者厥爲黑格爾之論理學。馬克斯曰，怪德國脫離賴曼那思（Ramennais）蒲魯東，聖西門，福路葉諸氏之形而上學與幻想之觀念者黑格爾之論理學是也。但就吾人今日所知者，此論理學固一純粹唯心主義也。

馬克斯以其整個系統置於實在之上，是其主張適與唯心主義者相反，似無疑問。但人人謂其非一純科學家，謂其已脫盡形而上學之傾向也。吳德曼曾有公平之言曰，馬克斯之歷史理論，仍是目的論的，且有不少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之痕跡。總之，謂馬克斯爲形而上學者可，謂爲唯心主義者亦可，甚至謂爲意識形態者亦無不可也。

馬克斯之斥責法之作家，不稍寬容，尤以蒲魯東爲最，以其往往求助於情緒或公正之概念也，馬克斯認此爲極端荒謬，因公正之觀念，隨經濟組織而有變化，且千八百年來之正義呼籲，有如緣木求魚，何嘗有絲毫效果乎。凡此所言，乃馬克斯開始著作時之用語，此吾人須謹記，然後此馬克斯之觀念，未嘗變更乎？

言雖如此，然馬氏固亦嘗訴諸人道與正義矣。馬克斯所予彼之友人以及接近者之印象，曰良善，曰易感者，曰一腔熱血扶助弱者之人也。芮梭諾夫 D. Riasonov 曰：馬克斯不僅是「一偉大的天才者，」第一流的思想家，與一熱心革命者而已，亦一處處赤心爲人類而不知有

已者也。雖其態度，有時不免粗魯，然其對於勞苦者被壓迫者，實藏有無限之熱情，文暢而動人之資本論，足可明徵。馬克斯說明資本主義來源之不當，吾人可假阿格爾之言曰：「假令金錢以血汗而生，則資本者，乃民脂民膏也。」

馬克斯忠告工人者在組織，其共產宣言結論中之口號曰：「全世界的工人們組織起來！以爲歷史的定律將操必勝之權而有此舉？（馬氏以爲此定律必不可免。）抑藉此以產生合理的社會耶？欲一偉大運動可能而又有效，不能僅持物質上之利益，更須鼓勵此輩實行者以熱誠，始有最後之勝利，馬氏抑有此直覺乎？」

果馬氏是一純科學家，則於其計畫之實用，當無動於中，同時，假令馬氏深信其所表述之歷史的定律，一無舛誤，可靜坐室中待所期者光臨。實際上，彼不此之圖，唯汲汲於社會主義宣傳之成功，普遍於世界。吳德曼以此矛盾歸諸革命的與辯證法的趨向間之障礙；曰：馬克斯主義者心中充滿了自由與正義之情緒，但彼輩腦中只知黑格爾辯證法。」

吳德曼此言，洵屬良是，唯物史觀非獨源於黑格爾哲學或社會現象中推演得來，實亦由革命的精神中體驗得來。致若謂馬克斯與安格斯雖亦重視個人意志，毋寧謂爲重視社會集團意志之爲當。此其所以於無產階級中從事宣傳認爲有價值也。

事實上，此學說實爲革命家之唯一武器，且於工人階級之組織，尤有莫大之貢獻。自從

馬克斯謂社會主義體制之實現爲勢所必然。此言也，驟視之，殊覺驚奇。吾人姑認此類革命之發生，毫無可疑，不久必成事實，然則激成此行動之導火線爲何？馬克斯揚言救世主已到，從種種方面觀之，得毋有伴爲先知者之嫌乎？

第六章 馬克斯之預言果已實現乎？

馬克斯之預言，並未完全實現，此爲吾人所當知。自共產宣言發表後，七十餘年來實業與資本之集中，雖已逐漸進展，但其發展程度終不若馬克斯所料之甚耳。

德國社會主義者貝爾斯坦氏之評論，值得吾人注意。貝氏曰：「當時投資股份公司之股東數，非但減少，且有增無已。或曰，不記名股份之統計，不足徵信。姑如是云云，茲請以英國家庭收入言，英國收入年爲一五〇一、〇〇〇〇鎊之家庭，在一八五〇年時，爲三〇〇〇〇〇戶，迨一八八一年時，增至九九〇，〇〇〇戶，此亦一饒有意義之事也。是持有財產者數目之增加，與人口數目之增加不能比例矣。繼又曰：小規模與中等規模企業之數目，尤以後者爲最，亦復有增無減。大公司數目亦有增加，但其增加，並非兼併多數小公司而成。在工業方面，新的專門事業繼有建設，大企業多有因此而更發展者，最後完成之工作，多由中等規模的與小公司從事進行。在商業方面，雖亦設有較大之百貨商店與食品公司，但不若

實業集中之顯著耳。

貝氏之觀察，頗饒意義。工商業集中之時期，較馬克斯者所料者爲遲。此事實也，不能因此謂「時間與事實無涉。」時間要爲不可忽視之因素也。雖然，貝氏於集中的界限，猶失之太寬。吾人注意當時小公司雇用工人比較減少，數目上亦有限制，而大公司職工數目增加由五〇至一〇〇。金融資本主義之集中，同一毫無疑問——甚至其集中程度較之實業資本主義之集中，尤爲顯著。凡此所言，或爲非常之現象。賈德斯基 *J. A. J. J.* 之意見，亦與此相左。迨戰後，此類集中已趨緊張，且牽及貧窮官吏，與恃所得而生活者，如當時法國中等階級，造成極堪注意之百分率。德國中等階級之情況，較法尤壞。雖工商界需用多量技術人員，是此服務者不致有如中等階級之缺憾，但此輩專家多數雖可度其「布爾喬」生活，然亦僅靠薪金度日耳。

馬克斯亦嘗預言小農租地制之消滅矣。彼以英國之實例言之，深信此輩小農與工業集中積不相容。然此小農租地制，實爲發展農業必不可少之過渡階段，但終因下述之原因，而趨消滅。如租可自給之鄉村家庭工業，因大工業之發展而崩潰也；土壤之逐漸荒瘠也；社區土地之被大地主掠奪也，此土地實爲小農之第二補充財產，以其可以飼養家畜也；因農場制度或因實行一種資本主義農業企業之競爭也。農業改進之結果，一方面殺賤，他方面更須多量

投資與生產物質條件之變化，亦為形成此類結果之原因。英國在十八世紀上半葉之情形，即係如是。

馬克斯又曰，小農產業因高利貸與納稅而喪失。為購買土地而資本流出，於是不得不求諸耕種滋息。生產工具之浪費，能力之虛擲與土壤之荒瘠，在在足為小農產業之致命傷也。小租地制之演進，並未有如馬克斯所預料之趨向，此不難尋其實例。在鞏固之國家，如法，如德之西部，無損失可查考，小地主之狀況，亦未發生惡劣不堪之現象。又如斯干的那維安諸國，尤以丹麥為最，農民尤多富裕。又如澳大利亞王國，因一八四八年之革命，此類財產更隨封建遺跡而解放。又如俄國，一九一七年之革命，其重要之結果，本為貴族所有之財產因而喪失，農民之所有，隨之鞏固是也，又如波蘭，羅馬尼亞，布爾加利亞，戶古斯拉維亞諸國，最近更實行土地改革，限制租地不得超過規定數目之趨向，而於農民所有更謀擴張。最後，資本主義農業的生產，並未苛征，蓋農業的生產，端賴世間最穩固之原素如土壤是也。惜此點往往不為人注意耳。

一九〇六年賈德斯基為共產宣言作序言曰：「就古今之大事，已足為馬克斯學說之充分的證明。」此言也，何其誤解現實耶？布爾希維克者之革命，雖曾發現於吾人前，豈知適為馬克斯預料之反證。當此革命脫穎而出之時，此歐洲國家（俄國）之資本主義僅具雛形，是

此革命至少爲共產主義社會開一方便門矣。要知此次革命，乃一「偶然的事件」，且亦源於此廣大國家政治組織不良所致。加之，俄皇權力之凋殘，自然一任有力之異教徒把持一切矣。

吾知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之危機，爲馬克斯時刻不忘，以其期望此經濟恐慌中能演化一新社會也。不知當國富民裕之時，社會革命殊難脫穎而出，况一八四八年之危機發生後，繼之豐年，反革命當道之日乎。馬克斯於一八五〇年語吾人曰：「欲社會革命之實現，只有在生產力與布爾喬生產形式互相衝突之時。非危機繼之以危機，革命難望實現，而此次危機確信乃最後的一次也。」

十九世紀之前半葉，屢有經濟恐慌，性亦嚴重，此爲事實，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罕見，有之亦不若前之嚴重，貝爾斯坦所云如是，此何故歟？市場之擴張，生產力之發展，有以使然。一九〇〇年之恐慌，美國獨未波及，亦一饒有趣味之事也。某種工業生產過剩，或可發生地方的恐慌，但不必一定普遍發生恐慌也。生產紊亂，固爲恐慌之原因，但加太爾與托拉斯已爲之解決一部矣，以其效率殊大故也。（賴司古 J. Lequire 持此意見。）貝氏又曰，此問題不能作抽釋的解決，普遍的恐慌，或因不可預見之外界事件而生，而非由於經濟現象所主動。其實，經濟恐慌，源於大戰之結果，而非由於資本主義之軟弱無能。以言共產革命

實行成功者，僅俄一國而已，語其原因，斷非獨源於經濟的原因，此敢斷言。馬克斯主義理論家，期望因危機而社會革命生，最後亦自認無謂矣。

世界文明國中之社會主義的政黨，對於「突變」的革命，已不復期待。安格斯意亦云然。資本主義之所以能抵抗者，在其有真實力量。此所以彼輩在最近之將來，不復望社會有急進的突變，而於專與資本主義實力相爭扎之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及工會，勉力加以抑制者，即以此也。先是馬克斯於勞動立法，乃至於工會之組織，疾惡若仇，蓋懼部分的改良，將分化產生革命之抵抗性，然最後亦不得不改變其曩昔之態度矣。此「改良主義」之發展的趨勢，不啻為各國社會主義者之當頭棒，其意義之深，遠過於世界大戰，亦第二國際之所以有其最近之趨勢的根本原因。同時，吳德曼曰：最溫和之改良主義者，如韋伯夫婦，日益急進，且認改良也者，乃真實的社會革命途中之階級，此與郁萊 (Turgot) 意見相似。郁氏於其社會主義研究一書中，主張革命演化說，研究未來之共產社會或現代社會之原理。

是以假令馬克斯之預言未經證實，假令現代社會的經濟演進亦未全依計劃之途徑，因以劃定之詞表述演進的定律為不可能之事，易言之，一個真實定律，其預見不能免其實現也。

貝爾斯坦曰：資本論者，不朽之傑作也，以忠實的智力構成，充滿深遠的實在。但馬克斯不能決志毀其「棚架」，因其太小而不適於建築物也。馬氏寧就建築物加以改造之。此棚

架即成見的學說，辯証法的結果也。

何以唯物史觀與現代事實積不相容，此其故不難知。正如吾人所見，以其與歷史的事象往往相衝突故也。更有進者，馬克斯與安格斯，缺少堅強之意志而富有彈力，獲益於經驗者固不少，然亦棄其有效的部分，此為吾人所當深識者也。

安格斯最後嘗信上層構造，非獨由於經濟基礎所決定。馬克斯初亦以為一切改良，乃阻止突變的革命拯世界於解放中也。是以極力反對改良與工會之組織。終則改變此急進的態度，共產宣言中曾曰：此類改良不過影響「工人的個人利益。」迨一八六二年國際成立時，馬克斯之就職詞曰：十小時工作律，乃社會解放之先聲，「不僅有偉大之實效，亦資產階級經濟降服於工人經濟之前也。」

馬克斯之信徒，其態度之強硬，嘗有過乃師者。某日，貝爾斯坦曾謂，持有財產者之數目，係增加而非減少，而賈德斯基答曰：一如其然也，則吾人勝利之日，不將溘溘無期而永不能達目的乎！果增加者乃資本家而非無產者，是吾人之目標愈遠，演進愈多，於是鞏固者乃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矣。「賈德斯基以辯證法之概念，認為要得事之有為，祇有待「情勢緊張」之降臨耳。賴布里奧萊視下層構造之優越，較安格斯甚至馬克斯，尤為嚴格。

再生雜誌 第二卷 再生雜誌 第二卷 再生雜誌 第二卷

第四期 目錄 第五期 目錄

第六七期合刊 目錄

閩變的涵義……………記者

論建國與專制……………王希和

統一思想問題……………諸青來

從社會形態的發展的方面改造社會……………牟宗三

社會問題之解決的社會哲學基礎……………朱亦松

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張君勱

序嚴羣亞里士多德之倫理思想……………張君勱

論民主……………吳惟平

東西政治思想之比較……………張君勱

能強與能弱……………嚴羣

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改造現社會……………牟宗三

一個研究社會學的立場朱亦松經濟眼鏡中之軍備問題欣 照

選舉與代表制度……………鄒文海

選舉與代表制度……………鄒文海

選舉與代表制度……………鄒文海

范格門教授新著之世界經濟的組織及其波形 黃超谷

蘇聯計劃經濟之進行……………孫寶毅

理解，創造與鑒賞……………牟宗三

中外大事記……………冰 森

蘇聯計劃經濟之進行……………孫寶毅

財產在事實上及觀念中之歷史演化……………費孝通

(Ronin 原著)

所能問聞。此種情形，近已引人注意，改良之謀，亦已影響於立法。雖彼等之改良多自個人主義出發，猶少社會主義之傾向。彼等理想之社會有若中世紀之組織，主張個人自由不加限制者，蓋爲小農及小工業吐氣也。

此概念應用於土地，自有相當限制。其發展似被阻於經濟之實情。如生產之大規模化，交易範圍之推廣，及性質上複雜等是。但此原則能於財產概念中承認一不能毀滅之中心價值一點，實足稱道。私有財產之能有價值惟在其能充實爲人之人格，公有財產於其表現及發達各人之社會生活一點上，亦有同等之價值，現代經濟改造問題中，即在尋求一種方法能適合於近世之工業狀況，而使每人均能於工業制度得一地位，如其生而有之權利。並且得保留其享用公共產物中可視爲己有著之權利。可不倚賴私人之憐惜而生，亦不受公衆獨斷之拘束。

此問題之另一方面，則爲國家如何能得到一切自然富源及遺產之終及所有權，及如何能爲支配工業活動及勞動契約之最高權力。吾人不能重建原始之共產。吾人亦不能舉各人之遺產，土地，及耕種之夥伴，一一保證其不失。吾人之目的乃在於個人與社會之關係上，一方藉教育及訓練，一方由統制工業組織，務使古代原有之安全，及近世之自由合而得之，俾各人能安生於近代複雜之狀況中，務使勞動者能無失業之危險，並於相當之勤儉中，使各人能於病痛等不幸事件發生時，猶能維持。因此種種，吾人須使社會對於一切生產所需之物能有

直接之所有權。簡言之，即使「使用之財產」歸於個人，「權力之財產」歸於民主之國家也。

我們經濟政策的要點：

關於工業的：

- △國家於全盤經濟計畫中，依社會之需要，規定工業開發之程序。
- △依工業之性質定公有私有之分別；凡天然富源與公用事業如礦業電力鐵路等，以公有為原則，但已歸私有者得議價收回之。
- △各項企業依計畫所定得招致國內外商家參加，其首先投資者許以減稅或減輕運費等優待權。
- △由國家就交通發展狀況依農林牧礦所在地勢，在全盤工業計畫上制定各種製造業之分配。
- △獎勵特種國貨之製造，並保護技巧之手工業，由國家與以補助或保證其貸款之利息。
- △原料品免除運輸捐稅。